

TIAN JIN SHI ZH

敬请各界朋友监督——

在内容上,提高学术性、知识性、  
资料性、可读性,加大信息量;  
在形式上,活泼多样、美观大方、  
图文并茂、新颖明畅;  
在文字上,精心校对、求真求实、  
字斟句酌、力臻完美。

# 目 录

##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方志工作之为助力滨海新区

高质量发展 ..... 滨海新区地方志办 (3)

## 读志用志

以精品年鉴为基准 全面提升年鉴质量 ..... 温 鹏 (6)

品读《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有感

..... 王宗征 (10)

从明清时期方志等文献看天津地震灾害

..... 薛 娜 崔 娜 (14)

## 史学百家

英美烟公司在天津的广告活动 ..... 曲振明 (17)

辛亥革命前天津出版概况 ..... 张 岩 (25)

明清时期影响天津水稻发展因素的研究 ..... 张存信 (33)

天津进士赵銮扬生平考略 ..... 雍 跡 (39)

## 志述津沽

旧时的津郊水会 ..... 王庆普 (47)

蒋秋吟诗涉武清谈 ..... 侯福志 (51)

蓟州区古代的清官廉吏 ..... 刘 春 (55)

## 信息动态

市级动态 ..... (61)

区级动态 ..... (64)

天津市档案馆开展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 市档案馆机关党委办公室 (封二)

天津市 2023 年地方志业务培训班圆满完成

.....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封三)

2023 年第 4 期(总第 207 期)  
(双月刊)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编印单位: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

员会办公室

编 办:天津市地方志馆

编印人员:吴爱民 赵敬义

梁 娜 岳 宏

柳 杨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1 号增 1 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58037686

邮 箱:tjsdagdfzg02@tj.gov.cn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号:

TJNZ2023109

承印单位:天津中铁物资印业

有限公司

本期印数:1300 册

印刷日期:2023 年 8 月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方志工作之为助力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

滨海新区地方志办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科学谋划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是团结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滨海新区地方志办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地方志工作上落地见效，以方志工作之为助力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

## 一、在深学细悟中凝心聚力，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培根铸魂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深刻领会思想精髓、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在全面系统学上持续用力。原原本本、逐字逐句的学习，才能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滨海新区地方志办以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为契机，采取集中学习、培训讲座、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系统的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深刻领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同时，把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同学习党章结合起来，同学习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二十届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有关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学习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

在融会贯通学上精准发力。党的二十大精神内容十分丰富，既有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理论上的深邃思考，也有目标上的科学设定和工作上的战略部署，只有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相统一，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反复思考，才能学懂弄通、融会贯通。滨海新区地方志办聚焦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着重把握九个“深刻领会”的要求，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工作部署，真正扑下身来、静下心来，组织方志部门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深钻细研上花气力，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彰显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



意义、世界意义，学出坚定理想信念，学出对党绝对忠诚，学出方志责任担当，不断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在联系实际学上升级加力。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自觉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要把指导工作实践、研究解决问题、推动方志发展作为学习的着力点，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联系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具体实践，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志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联系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实际，联系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八大工程，把本职工作摆进去、把职责任务摆进去，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服务发展的能力本领、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推动发展的创新招法。坚决防止学归学、用归用、学用脱节、出现“两张皮”的现象，更不能坐而论道，成为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 二、在深思笃行中创新奋进，以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导新时代方志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作为地方志部门要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的职责使命，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地方志工作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坚持政治方向不偏航。地方志不仅要记录新时代，更要在讴歌新时代、服务新时代上做

文章下功夫。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方志工作，忠实履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职责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守为民修志的理念，坚定历史和文化自信，牢牢抓住志鉴编修这条主线，客观、真实、全面记载现代化建设奋斗历程和历史成就，更好地突出时代特征、反映地方特色、体现年度特点，真正让方志文化“立起来”“活起来”“强起来”，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坚持质量至上树精品。质量是志鉴的生命，是衡量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地方志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工作中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精品至上的原则，把质量意识、精品意识贯穿于修志编鉴工作全过程，对标对表中指组、中指办、市地方志办有关质量要求与规范，认真落实《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字关、保密关、出版关，编纂出版更多经得起时代、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秀地方志成果。

坚持守正创新求特色。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要求地方志工作也必须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样才能让地方志这一古老文化熠熠生辉、历久弥新。推进新时代地方志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不断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以创新驱动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编修更多优秀地方志成果，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使悠久的方志文化始终保持勃勃生机。

坚持服务为本可利用。方志文化不仅仅是



“遗产”，更是“活物”。只有围绕中心工作、融入发展大局，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才能更好发挥地方志应有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要坚持修用并举、修志为用，延伸方志工作触角，找准方志工作定位，拓宽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形成修用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发挥地方志贵在史识、重在致用的重要作用，推进地方志成果社会共知、资源社会共享，使地方志在为全局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上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 三、在深入践行中求取成效，以高水平方志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关键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我们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履行职责使命、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美丽“滨城”建设提供高水平服务。

在提升志鉴编修质量上下功夫。巩固《天津滨海新区年鉴（2022）》成功入选第七批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成果，持续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在坚持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的同时，着力在求新求精上花气力，保持“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缩短出版周期，力争实现年内出版。积极推动《天津港保税区志》《中新天津生态城志》编修工作，争取早日完成出版。

在扩大志鉴覆盖面上下功夫。主动加强与开发区、部门协调，有序推进志鉴扩面编修工作，逐步增加部门、专业志鉴数量，记述好新时代新征程各条战线的奋斗历程。积极与镇街沟通，有计划、分步骤推动志鉴编纂向镇街、村延伸，鼓励有条件的镇街按年度公开出版年鉴，记录时代变迁，留住乡愁记忆，助力乡村振兴。

在推动地方史研究上下功夫。积极探索推

进地方史研究和编著工作，推动镇街史、村史建设，鼓励历史资源丰富的村镇建设史馆。配合区委宣传部举办“走进古籍品读家国情怀”滨海新区古籍科普展，宣传普及方志文化知识，展示地方志编纂和收集研究成果。加强地方志文献研究，深入挖掘滨海新区地方史和地情资源，为《天津史志》提供研究成果。编修《滨海新区大事记（2010—2020）》，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历史文化、地情文化的需求。

在加强信息化建设上下功夫。以示范数字档案馆建设为带动，加快推进志、鉴资料数字化，尽快实现馆藏一、二轮志书以及区级综合年鉴全文数字化。依托区档案馆网站，完善地方志资料，为人民群众提供地方志资料在线阅读、查阅利用等服务，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展示滨海新区现代化发展成就。

在开展读志用志上下功夫。加强方志文化宣传，开展方志“六进”活动，组织精品年鉴品读活动，广泛进行地情宣传和历史文化传播，进一步推动形成全社会读志、用志良好氛围。积极推进精品年鉴手机版掌上阅读的开发利用，更好助力读精品、用精品。加强与档案、图书馆等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方志文化影响力。不断丰富地方志资料收集范围和渠道，充实志鉴书籍、地情资料、图片、实物等资源，发挥资政辅政功能。

在抓好人才队伍建设上下功夫。着力培养地方志业务骨干，重视人才选拔、交流、培养和使用，培育优秀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充实地方志队伍。开展地方志业务培训，举办志书、年鉴编纂等培训交流，进一步提升地方志编纂人员理论素养和专业素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努力建立一支与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相匹配、专兼职相结合的人才队伍，为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 以精品年鉴为基准

## 全面提升年鉴质量

温 鹏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的“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提供了年鉴编纂的样板和研究靶向，通过广泛开展品读、讨论、交流等一系列活动，构筑起品评感悟、思考分析、提高升华的平台，为充分发挥中国精品年鉴的引领作用赋予了推进动能，通过以点带面，实现编纂人员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年鉴编纂质量的提高。

### 一、品读精品年鉴，广泛汲取成功经验，为年鉴质量提升夯实基础

#### （一）读精品年鉴精华，创年鉴品牌特色

发挥好中国精品年鉴的引领作用，必须用心品读精品年鉴精华。把握精髓，核心在质量。一部年鉴的质量，主要从三个方面考量：一是框架设计，二是条目编写，三是装帧设计。从这三方面着眼，中国精品年鉴均表现出其独到之处。框架设计紧跟时代发展，设置科学严谨，归属合理得当；条目记述完整，资料翔实，编写规范；装帧设计不落俗套，清新自然，专题图片设置特色鲜明，图文表录等多维展现。将精品年鉴的精华与年鉴编纂实际相结合，是提升年鉴质量的有效手段。

《北京朝阳年鉴（2020）》的显著特点是区域功能定位找得非常准，如：设置“功能区建设”类目，下设北京商务中心区（北京CBD）、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关村朝阳园、温榆河生态走廊、金盏金融商务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试验区等分目，凸显各重点功能区对朝阳区经

济的带动作用。《天津市北辰年鉴（2020）》特点突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如：在卷首设置“北辰名片”，集中呈现北辰地域面积、人口、年度经济数字和突出的国家级、市级荣誉，在目录中设置专题“图照”。《连云港年鉴（2019）》设39个类目、265个分目，按自然、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的顺序编排。框架新增设“一带一路”支点城市建设类目，将原作为分目的“连云港港”提升为类目，进一步突出全市发展的重点；设置海洋经济、开放型经济等类目，突出地方特色；将社会事务管理、公共安全类目整合设置成社会事务、社会治理类目，突出时代特色。在相关类目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税务体制改革、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园区管理体制改革、城市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分目、条目，突出机构改革大背景下各行各业体制机制的优化。《孝义年鉴（2020）》将工业类目中的“经济开发区”分目升格为“开发区建设”类目，下设综述、煤化工循环经济园区、铝系新材料产业园区、山西吕梁（孝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高新科技产业园区、科教文化产业园区等分目，详细记述孝义持续深化经济开发区“三化三制”改革、成立开发区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引进山东高端科技工程研究院在孝义设立山西分院等内容，多角度展现孝义经济发展的鲜明亮点。《长沙年鉴（2020）》通过增设类目、调整分目、归并子目等措施，彰显长沙

特色。如增设“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类目，记述长株潭综合一体化建设的地方特色；将“湖南湘江新区”“开发区”分目升格为类目，全面展现园区经济特色。

## （二）力求融会贯通，实现思想升华

发挥好中国精品年鉴的引领作用，必须通过对《中国精品年鉴》的深入品读，将品之所得、比之所见、改之所历融会贯通，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维磨砺，真正把握年鉴工作的规律，把品读成果转化推进工作的成效。一是用心思考《中国精品年鉴》如何做到严守规范；二是思考《中国精品年鉴》如何使资料系统全面；三是思考《中国精品年鉴》如何实现开拓创新。只有通过仔细品读、认真思考，才能借以为用，达到逐步完善自己的目的。

《北京朝阳年鉴（2020）》能够做到深挖资料，体现时代特征。如：重点收录朝阳区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抓好文化、国际化、大尺度绿化“三化”建设等方面的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效、新问题等资料。“区情概览”类目下包括地质地貌、自然资源、建置沿革、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区情特色、国家重大活动服务保障、“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等16个条目，信息覆盖面广，充满时代气息。《天津北辰年鉴（2020）》重点突出，亮点频现，精选年度特色活动，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题、首届道德模范、新乡贤。在“文化旅游”类目中设置“融媒体建设”条目，在部门分目中亦有所辖公众号、微博账号等情况。《孝义年鉴（2020）》在卷首设置“专题图片”，从数字孝义、城市名片、基础建设、经济发展、生态建设、文化生活、民生幸福等方面集中呈现孝义城市发展新貌；增设“专文”类目，收录6篇专题文章，分别从城市建

设与变迁、工农业发展、社会民生事业进步、创建文明城市等方面记述孝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深刻总结四十余年来孝义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经验。《长沙年鉴（2020）》注重用图片真实地记录历史瞬间，集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于一体，以纪实性、直观性、形象性发挥文字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卷首设置“70年长沙”“长沙夜经济”等5个专题彩页，增设长沙市文化地图，制作长沙荣誉、年度人物年度事件等专题版块，反映时代特色和长沙亮点。

## （三）以精品年鉴为引领，实现编纂质量飞跃

通过品读精品，使编辑人员对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勤学慎思，感悟责任，勇于探索实现开拓创新的新局面。在年鉴编纂实践中结合品读中国精品年鉴的收获，回望年鉴编纂工作，审视自己编纂的成果，把品读成果转化成推进工作的成效。要把握中国精品年鉴的特色亮点，借鉴好的经验做法，分析存在的不足或有待改进之处，提出优化思路和改进完善的具体办法，建立健全年鉴质量监管体系及其评价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摸清新时代年鉴编纂规律，探索编纂精品年鉴的工作机制和方法。要突出变革赋能，坚持理念创新，对标对表精品年鉴，精准取经，结合本地实际，吸收对标精品年鉴在特色、创新、规范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提升能力，积蓄力量，站在精品年鉴肩上起跑，提升年鉴品质。

## 二、红桥区上下同向发力，众手成就精品年鉴

《天津市红桥年鉴（2021）》争创“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工作于2020年12月正式启动，得到市地方志办和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各承编单位的积极配合。为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区地方志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谋划布局，众手成就精品年鉴。



### (一) 抓实三项工作，夯实精品年鉴基础

1. 抓实责任，加强领导。一是重新调整红桥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名单，区长任编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分管区领导及人大、政协相关领导担任，委员由各承编单位分管领导调整为一把手。二是各承编单位成立精品年鉴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单位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供稿人员为成员的工作机制。三是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目标要求，将具体工作安排细化，形成有力的保障措施。各承编单位由原来的不重视变为不怠慢，营造出全区大编鉴、精编鉴的良好工作氛围。

2. 抓实思想、加强共识。为动员全区各承编单位特别是年鉴工作者确保高质量完成精品年鉴申报工作，专门召开全区“精品年鉴”编纂工作动员部署会。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参加会议并讲话，从机构、人员、经费等方面予以全力保障，确保《天津市红桥年鉴（2021）》入选“中国年鉴精品工程”。特别邀请市地方志办相关领导参加会议，对红桥区地方志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此次会议对于精品年鉴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参会人员精品思想得到统一，精品意识得到有力提升。

3. 抓实培训，提升质量。创建精品年鉴的基础保证，在于有一支专业成熟的编纂队伍。一是加强撰稿队伍建设。动员部署会后，区地方志办立即召开全区撰稿人业务培训会，制作专题培训课件。分别从《年鉴编纂基础知识及规范》和《年鉴稿件撰写存在的问题及改善对策》两个专题进行详细讲解。通过组建精品创建撰稿人微信群、小范围培训、一对一交流、上门指导等方式，增强部门单位的精品创建意识，提高承编单位的稿源质量，保证年鉴内容的丰富性和准确性。二是加强编辑队伍建设。

选优配强编辑队伍，区地方志办有编内编外编辑人员5名，为创建精品打下良好的人才基础，同时在编辑部开展各类业务集训、主题研讨、交流学习，形成较强的工作凝聚力和战斗力，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中诠释了红桥方志人的使命担当。

### (二) 精品意识贯穿编鉴全过程，努力打造精品年鉴

1. 创新工作模式，保障工作进度。创新工作模式是保障工作进度的有效手段。根据以往2名编辑面对全区各承编单位，单兵作战，效率较低的情况，区地方志办仔细研判精品年鉴工作量，将全区承编单位分为6个工作组，每个人负责一个组稿件的上报、修改、补充、校对等工作，一跟到底，直至出版。设计制作工期表、任务图，挂图作战，进度明显加快。及时更新年鉴联络表，制作收稿统计表，从文字、图片、附录等方面详细记录各单位稿件报送情况，各承编单位短时间内全部完成稿件报送工作。编辑部采取边收稿、边改稿、边返稿、边补充的方式进行第一稿修改工作。截至4月底，完成全部承编单位的稿件二稿修改工作。工作模式的创新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保证了稿件的质量和完整性。

2. 突显核心要义，守正创新内容。《天津市红桥年鉴（2021）》坚持内容为王，注重全景再现、凸显亮点反映部门、行业的发展，增强年鉴的资料性和实用性。表现手法以条目文字记述为主、大量图表穿插展示等形式，直观展示本地域的年度发展成绩和特色，增强年鉴的信息量，提高可读性。以纲目设计的创新，引领全书编纂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在篇目中增设“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脱贫攻坚”两个分目。

3. 依托专家力量，提升年鉴质量。创建精

品年鉴离不开各级专家的有力支持。区地方志办积极借助专家智慧，邀请中指办专家审阅篇目，统一思想、开阔视野、学到真经、收获信心。认真听取并落实专家对篇目的修改意见，优化顶层设计、提升精品内涵。结合专家修改意见和参考其他省市精品年鉴篇目，按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要求，对篇目进行大规模调整，共调整类目9个，新增分目16个，调整分目26个，新增承编单位15个。诸如此类的创新形式，均体现年鉴编纂与时俱进的理念，以及落实中指办“创新设计为重点”的精品创建工作要求。

### 三、发挥精品年鉴基准作用，全面提升年鉴质量

近年来，红桥区地方志办公室紧扣时代脉搏，聚焦改革发展，围绕中心大局，不断创新理念，记录光辉历程，切实提高质量品位，全方位探索打造精品佳作之路。

#### （一）坚持科学组织、开门编鉴，不断提升效率与品质

提高编纂管理效能、提升年鉴综合品质，始终是红桥年鉴人孜孜以求的核心课题和努力方向。《红桥年鉴》2022、2023年卷在红桥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的领导下，遵循年鉴编纂出版规律，自觉秉承新发展理念，坚持思路创新、机制创新、手段创新，坚决摒弃以往年鉴编纂的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单位约稿由“提供什么编什么”向“编什么提供什么”转变，在组稿、编辑、排版、校对、印刷、出版等各个环节积极探索，全面对标对表，加速精品转化。

#### （二）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努力彰显个性与活力

红桥年鉴人紧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每年都对年鉴篇目进行调整，通过增设类目、调整分目、归并条目等措施，对框架结构进行优化，及时反映不断变化的新事物、新思路、新举措，提升年鉴可读性、可鉴性。打破原有惯性，充分运用表格、图片等形式增加年鉴信息量，增强内容可读性和直观感，紧扣时代特色遴选重要照片以达到“一图胜千言”的效果。

#### （三）坚持服务中心、传承文明，着力突出使命与担当

《红桥年鉴》始终坚守志鉴文化核心价值，突出编鉴为用，围绕服务全市大局、服务中心工作、服务社会需求，充分展现综合年鉴“存史、资政、育人”的现实功能。《红桥年鉴》2022、2023年卷以镜鉴现实为主轴，以反映时代脉搏、弘扬红桥文化为主线，紧扣年度特色，立足综合年鉴的宏阔视野，挖掘特色表现形式的特殊价值，有组织、有计划、有力度地突出年度重大事件，推介红桥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充分发挥年鉴记录历史的红桥特色。

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是培育精品意识和精品年鉴、提高年鉴质量的重要手段，是年鉴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坚持创新发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步骤，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有助于为当地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作为红桥年鉴人，要增强责任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志存高远，与时俱进，抓住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的机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履行职责，坚持新发展理念，记录新发展阶段，适应新发展格局，力求年鉴常编常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打造更多的新时代精品年鉴，为红桥留下堪存堪鉴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作者单位：红桥区地方志办）



# 品读《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有感

王宗征

历经近四载、数易其稿，由天津市蓟州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市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的第一部续志《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于2020年12月由天津市出版传媒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方志工作者，我细细品读这部31编、180多万字的区县级综合志书，感触颇多，其中感受更深的是，这部志书特色鲜明、资料厚重、要素突出、独具一格。读这部综合志书，不仅对蓟县这个“千年古县”的历史脉络，特别是改革开放到2016年38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生态、文化的发展进程有了全面、详细、清晰、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于极富蓟县地域特色的地方志资料有了全景式把握，使我在丰富史志资料的同时，对区县级综合志书的结构布局、资料选取和编纂取向有了新认识，从中受到启发，获益匪浅。

## 一、内容厚重，内涵深刻

通读《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一书，感到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蓟县地理、历史、人文元素贯穿全书，成为这部综合志书的一大看点。

在天津地区，蓟县的历史最为悠久，号称“千年古县”，其实追溯蓟县的历史远远不止千年。这一区域，既有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留下

的历史遗迹，又有轩辕黄帝曾到此问道仙人广成子的历史传说。蓟县不仅有厚重的古代历史，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蓟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形成的红色历史，也是蓟县史志的一大特色。虽然书中标注其上限为1979年，下限为2016年，但志书的编纂者立足蓟县历史实际，以其更宽的历史视野和颇具慧眼的历史见识，拓展和丰富蓟县方志资料内容，使这部综合志书的资料编纂得以延伸和深化，让读者更深更多地了解蓟县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史志资料。正如《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中《编修始末》所写：“蓟县是千年古县、革命老区，为此全书以《蓟州史略》开篇，以《蓟县革命简史》结尾，力求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色。”这样的谋篇布局，注重体现县域方志特色，增强志书历史厚重感，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为这部综合志书增加了内涵深刻的看点。

品读《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感到《蓟州史略》作为该书开篇，尤其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细细品读这一开篇之作，对古蓟州的由来和蓟县悠久历史有了较深的了解和把握。古蓟州在春秋时期属幽燕之地，秦代置县（无终县），隋大业年间改称渔阳县，唐开元十八年（730）设置蓟州。这里是秦始皇东巡、曹操北征乌桓、唐太宗东征高丽的经过之地，隋朝末

年燕王高开道称王曾以此为都城，这里是宋、辽、金争夺对峙的重要战场，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镇长城的重要防线，是清朝的“畿东锁钥”，康熙皇帝曾先后五次来此，其中四次登临盘山。这里还是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进攻中原、退守东北的重要通道。抗日战争时期，蓟县是冀东抗日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要地。解放战争时期，是平津战役指挥部和北平和平谈判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首都北京的东大门。蓟县是人杰地灵、人文荟萃之地，历史上陈寿、郦道元、陈子昂、李白、杜甫、高适、袁宏道等文化名人都在此留下传世名篇。而引领曹操打败乌桓后辞官不受、隐居盘山的田畴，《三字经》中所记“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窦禹钧，“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初宰相赵普等都是古蓟州人士，可谓名人辈出，灿若群星。这部志书收集和编纂的蓟州史志资料翔实而丰富，使读者对蓟县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多一分看重。

蓟县革命老区史志资料是极其宝贵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乡土教材”。作为《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的压轴性资料《蓟县革命简史》，被列为“专记”，凸显其史志价值的重要性。这篇“专记”，以1927年春天为上限，记述蓟县革命历史，蓟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中共蓟县县委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地下交通站）建立、打响冀东西部抗日武装大暴动第一枪、盘山抗日根据地创建、重创日军“扫荡”、支援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等内容，构成蓟县革命史志资料的重要元素，向读者展示了蓟县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其教育意义不可低估。

《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以《蓟州史略》开篇，以“专记”《蓟县革命简史》收官，充分凸显了蓟县史志特色和资料要素，不失为编纂者的创新之举。

## 二、特色彰显，个性化强

《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聚合蓟县山区地理地貌、生态环境、旅游业等主导产业、于桥水库及其库区以及红色文化、民间风物、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诸多特色鲜明的地方志资料要素，汇成一部篇目设计个性化强、资料收集和编纂独具风格的蓟县综合志书。

在天津地区，蓟县诸多方志元素是独特的，是其他区域不能复制和替代的，只有深入挖掘这些特色鲜明的蓟县方志资料“土特产”，精选细编，才能使志书内容重点突出，“蓟县元素”得以充分体现。该书编纂者努力挖掘“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特色篇目，单独升格设立环境保护、于桥水库、旅游业、盘山、林业、精神文明建设六编。可以说，这样设计篇目，处理和编纂方志资料，抓住了蓟县志书编纂的重点，彰显了编纂者用心睿智和用力方向的准确，才有了这部特色鲜明、要素突出的蓟县综合志书。

蓟县是天津地区唯一有山脉和山区的地域，燕山山脉特别是盘山，是蓟县独特的自然禀赋，也是蓟县地理、地质、地貌以及山区人文环境特色显著的自然依托。《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无论从概述，还是具体篇目，都对蓟县这些“特色”予以重点反映。该书《概述》中写道：“蓟县地势为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北高南低，北起长城，南至蓟运河，逐渐下降，呈阶梯状分布。北部最高点九山顶，海拔1078.5米。”“蓟县环境优美，



历史、人文、自然等旅游资源丰富，有世界文化遗产黄崖关长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独乐寺、千像寺石刻造像群及千像寺遗址；中上元古界地层剖面和国家地质公园；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八仙山；国家森林公园——九龙山。此外，还有九山顶、龙泉山、石趣园、蓟州溶洞、石龙峡等风景旅游区。名山、古寺、雄关、奇石、幽林、秀水集于一体，被誉为‘京津后花园’。黄崖关长城、盘山、独乐寺分别以‘蓟北雄关’‘三盘暮雨’‘独乐晨光’之名列入‘津门十景’。”由此可见，这些方志元素地域特色十分明显。

举例来说，该书《第二编 自然环境》之《第一章 地质地貌》，对蓟县的地层特点、地质构造、地貌特征等山区“底色”做了深入、周详、具体的记述，蓟县作为“天津市唯一山区县”的特点跃然纸上。为了更加彰显蓟县山区特色，书中把蓟县山区自然环境优势与蓟县旅游业发展融合起来，加以重点反映，既记述蓟县名山胜景，又记述蓟县依托山区优质旅游资源发展现代旅游业情况。尤其是《第十编 旅游业》，汇集了“蓟县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的方志资料，对蓟县“旅游资源”“旅游开发”“旅游特产”等进行详细介绍，特色显著，这部分内容在书中分量很重，引人关注。更值得一提的是，全书突出编纂“京东第一山”——盘山的方志资料，书中第十一编用5章20节专门记述“盘山”，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全方位汇集盘山史志资料，成为这部志书的重磅内容，俨然成了“志中之志”。《盘山志》之资料在书中所占比重之大、篇幅之巨，体现了志书编纂者践行“修志为用”理念，促

进盘山旅游资源有效利用，为推进蓟县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当然也为读者深入、详细了解蓟县盘山及其旅游资源提供了翔实鲜活的方志资料。这是该书编纂者在志书存史和资治方面所进行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该书《第九编 库区》也深深吸引了我。于桥水库又称翠屏湖，地处州河上游、于桥盆地，为蓟县和天津市重要水源地，是引滦入津中转水库，不仅为天津市生活生产提供水源，也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源保障，其水利地位十分重要。书中专设一编，对于桥水库及其库区连同与之密不可分的引滦入津工程进行详细记述，通过翔实鲜活的方志资料，反映蓟县于桥水库库区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为保障水库水资源高质量和促进库区环境优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其史志价值很高。

关注和留意蓟县特色鲜明的文化元素，也成为我对这部综合志书阅读的一大取向，而这部志书恰恰满足了我的这一欲望。品读后了解到，蓟县的山水文化、盘山文化、石趣文化、山林文化、古树文化、古迹文化、宗教文化、旅游文化、矿产文化、山货文化、库区文化、红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作为这部综合志书中特色彰显的方志资料元素，既厚重又鲜亮，它们分布于该书不同编、章、节、目之中，印证和诠释蓟县优美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与蓟县人民生生不息的奋斗、创造和开拓历程，构成了全书十分抢眼的地域文化特色，增强了人文内涵和文化魅力，让这部志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更强。

一部成功的地方志书，应该遵循志书编纂规律，具有共性化的篇目设计和方志资料编纂

方式，但更为重要的是，把体现地域特色作为志书编纂工作的着力点、用力点和主攻点，把突出地域特色的方志资料的关键性要素充分凸显出来。这就需要志书编纂者立足所在区域，深入挖掘、占有和把握当地具有代表性、最能反映当地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鲜明符号乃至“名片”的方志资料，并将这些个性化资料加以梳理、整合、提炼，这样编纂的地方志书才会名副其实、独具特色。该书堪称是一部特色鲜明、质量上乘的综合志书。

### 三、图文并茂，清新鲜活

《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谋篇布局富有新意，编纂风格新颖别致，全书条理清晰、图文并茂、文气贯通，而且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文风质朴，是一部历史感、时代感、创新感都很强的地方综合志书。

该书的编纂方式方法可圈可点，有三点更值得称道：一是首尾呼应，开篇和收篇内容充实，资料厚实，可谓起好头、收好尾，构成了虎头豹尾；二是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志书体裁齐全，各种体裁相互依托、互相支撑，构建了全书的系统化格局，以多种形式反映蓟县历史沿革和发展进程，聚合蓟县方志元素尤其是特色鲜明的方志资料要素，形成科学性、学术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三是图文结合、图文并茂，收录的700余幅图片（照片）灵动活络，既展示蓟县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生态建设、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群众文化的人文风貌，也有古城、名山、雄关、碧水、奇石、幽林、古刹、古树等自然景观、民间风物、历史文物的写真，从而使这部综合志书的直观效果和鲜活度更强。

品读《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也有

不足之处。一是一些文字表述缺乏细致斟酌，有不够规范的地方。比如，书中《蓟州史略》部分，记述“唐代，渔阳县普遍栽植槐柏树，后称唐槐、唐柏”，把槐树和柏树写成“槐柏树”，不够严谨，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引述《蓟州志》记载“为求治国修身养性之道，轩辕黄帝曾经来到蓟州城北的府君山（古称崆峒山）问道于仙人广成子”和记述唐朝时渔阳县，引述《蓟州志》中相关记载，本应注明这本《蓟州志》问世年代或者时代，但行文中只是笼统地说《蓟州志》，许多读者并不清楚这部《蓟州志》的来源，不免有些模糊；又如书中“概述”部分，个别地方对（蓟）“县”和（蓟州）“区”概念的表述不够协调一致。如“2016年，全区辖26个乡镇、949个行政村、1个城区街道办事处30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86.25万人。2016年，全县实现地区总产值422.98亿元，按三次产业划分，结构比例为7.2:31.1:61.7，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4.64万元。”同是说2016年，一会说“全区”，一会说“全县”，有概念混淆之嫌。二是在一些表述上存在主观介入色彩，有悖志书语言客观的规则。如书中“概述”部分中“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中的“有力”、（蓟县工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的“令人瞩目”、“招商引资硕果累累”中的“硕果累累”等词汇，主观介入性太强，与志书语言风格不相称。

尽管《天津市蓟县志（1979—2016）》一书存在微疵，但总起来说，作为一部特色鲜明、要素突出的志书，该书为区县级综合志书编纂提供了有益启示，其编纂思路、主要做法和所取得的经验，值得修志者学习和借鉴。

（作者单位：宝坻区档案馆）



# 从明清时期方志等文献看天津地震灾害

薛 娜 崔 娜

明清时期，我国地震活动频繁，特别是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前期发生了多次特重大地震事件，包括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华县特大地震（又名关中大地震）、清康熙十八年（1679）三河—平谷地震等。随着明清时期地方志的编纂，以及清朝末期报纸等媒体形式的出现，天津地震活动“明代地震史料增多，清代地震记载较详”，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地震文献档案。当前学者对明清时期地震灾害及抗震救灾等开展了一定的研究，但针对天津地区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缺乏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分析研究。基于此，本文通过查阅相关历史文献，对明清时期天津地区发生的地震事件，以及周边地区对天津造成重大影响的地震灾害进行梳理分析。

## 一、明清时期天津地震情况

### （一）天津地震地质构造背景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位于我国华北平原地震带和张家口—渤海地震带的交汇部位，境内分布较大规模的隐伏断裂 19 条，其中 4 条穿过中心城区。此外，天津 90% 以上区域为软土场地，容易造成砂土液化、软土震陷等地质灾害，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sup>[1]</sup>。1982 年，天津地震地质学者在宝坻区里自沽地区发现的古地震遗迹表明，远在 4000 余年前就发生过强烈地震。

### （二）明清时期天津地震事件及特点

明清时期，随着华北地区进入地震活跃期，天津境内地震活动较为频繁，根据笔者对相关

文献档案的梳理，在此期间，天津境内共发生较为显著的地震 21 次（见表 1）。

### 二、明清时期天津地震受灾情况

明清时期，天津境内地震多为 5.0 级及以下地震，多数未造成严重的地震灾害损失，根据表 1 可以看出，受灾情况主要以“房庐有覆者”“屋宇摇动，房梁板壁被撼有声”等建筑物损坏为主，并伴有“雷电雨雹，形如鸡卵”等天气异象。两次 5.0 级以上地震，1621 年 2 月武清 5.5 级地震，造成“东南城垛震落，屋壁半颓，间有压死者”；1626 年 5 月蓟县 5.5 级地震，造成“蓟州城东南震塌，坏屋数百间”。虽天津境内地震未造成较大灾害，但天津周边地区曾多次发生破坏性地震，给天津带来较为严重的地震灾害，其中灾害损失最大的为 1679 年河北三河—平谷 8 级地震和 1888 年渤海 7.5 级地震。

### （一）1679 年三河—平谷 8 级地震

清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679 年 9 月 2 日）河北三河—平谷地区发生 8.0 级地震，最大地震烈度达到 11 级，波及天津并造成巨大损失。据乾隆《武清县志》卷一、卷四记载，武清县“公署庙宇圮者十之八。居民墙屋倾倒，压死甚众”。《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上册）记载，宝坻县“瓦房 247 间，圮 104 间，坏 53 间。土房 435 间，圮 265 间，并死男 1，女 1，女孩 1”。清张朝琮、崔颜《蓟州志》卷一载，蓟县“房屋倒塌无数，压死人畜甚多”。乾隆

[1] 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防震减灾“十四五”规划》，2021 年。

表1 明清时期天津地震事件统计表

序号	时间	地点	相关记录
1	明成化十七年(1481)	蓟县	五月戊戌，直隶蓟州遵化县地震（《明史》卷三〇《五行志》）
2	明弘治二年(1489)	蓟县	九月，蓟州、遵化、宽河地震四次，有声如雷（《明孝宗实录》卷二八）
3	明弘治二年(1489)	蓟县	十二月，顺天府蓟州地震（《明孝宗实录》卷三二）
4	明弘治九年（1496）	蓟县	壬戌，顺天府蓟州及遵化县地震二次，俱有声如雷（《明孝宗实录》卷一〇九）
5	明嘉靖二年（1523）	蓟县	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子时，地震有声，卯时及午时复震，未时雨雹如粟大（明·熊相《蓟州志》卷一二）
6	明隆庆二年（1568）	蓟县	蓟州遵化县地震有声，雷电雨雹，形如鸡卵，积地寸余（《明穆宗隆庆实录》卷一八）
7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静海	六月初六未时静海县地震有声，自西北起，向东南止（《汪应蛟：地震疏》卷五）
8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天津	壬子，天津卫地震有声（《明神宗实录》卷五三〇）
9	明天启元年（1621）	武清	自辰至寅，东南城垛震落，屋壁半颓，间有压死者（《武清县志》卷四）
10	明天启六年（1626）	蓟县	天启六年丙寅五月初六日地震，蓟州城东南震塌，坏屋数百间（《蓟州志》卷一）
11	明崇祯十四年（1641）	天津	四月，天津地震，巡抚李继贞以闻（清·吴伟业《倭寇纪略·虞渊沈·地震》卷一二）
12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	武清	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初一日地震（乾隆《武清县志》卷四）
13	清嘉庆二十年（1815）	天津	七月初一亥时地震，次日寅时复震，房庐有覆者（《续天津县志》卷一）
14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	天津	丙子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十四日申时地震有声（《续天津县志》卷一）
15	清同治十三年（1874）	天津	四月五日晚上九点半左右，天津和周围乡村的人们都感到地震，跟着就听到冲击声，家里放着或叠着的碗碟等由于震动而咔嗒作响（《字林西报》[英文]1874年4月6日）
16	清光绪十四年（1888）	天津	此地（天津）感到一次轻微的地震，未造成损害（《中国时报·简讯》[英文]1888年3月24日）
17	清光绪十四年（1888）	天津	天津于6日，星期天午前2时55分发生持续稍久之地震（《字林西报》[英文]1888年5月17日）
18	清光绪十六年（1890）	天津	上星期三下午九时（4月2日），天津经受一次地震，延续数秒钟（《字林西报》[英文]1890年4月7日）
19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天津	1896年7月22日，天津受到相当强烈的地震（《字林西报》[英文]1896年7月29日）
20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天津	初七晚，梁园门外东首，所有房屋，于十点三刻时，忽然震动（天津《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
21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天津	是日子时，津郡陡觉屋宇摇动，房梁板壁被撼有声。是乃地震也（《储仁逊：蔚心堂闻见录》卷十）



《武清县志》卷四载，震后，朝廷“诏遣部员赈恤，给银有钱”，典史李涛、教谕李衷绣、贡士李可桢、训导陈际隆、进士赵珣等捐资修葺。

## （二）1888年渤海7.5级地震

清光绪十四年五月四日（1888年6月13日）渤海湾发生7.5级地震，6月13日、7月6日又先后发生了6.0级、5.5级强余震。据记载，天津“地震的震动很频繁，有时人们一天里感到六次或更多次”<sup>[1]</sup>，“本邑倒塌房间何止百家”<sup>[2]</sup>，“初时房屋门窗嘎嘎作响，继而壁间字画摇摇如悬旌，所挂之灯更有从堕下者”<sup>[3]</sup>，“房屋墙壁剧烈摇晃，地面宛如大海波浪滚滚前进，起伏不已”<sup>[4]</sup>。

## 三、对明清时期天津地震情况分析

根据对历史文献的统计分析，明清时期天津共计发生显著地震21次。其中，从地震强度来看，地震活动主要以5.0级以下地震为主，其中，3.0—4.0级地震6次，4.0—5.0级地震13次，5.0级以上地震2次，分别为明天启元年二月武清5.5级地震和明天启六年五月六日蓟县5.5级地震。从时间分布来看，明清时期天津地震活动分为两个活跃期，第一个活跃期为1481年—1641年，第二个活跃期为1815年—1903年，特别是清光绪年间的地震活动最为活跃。从空间分布来看，蓟县地区地震活动最为频繁，其原因与蓟县地处我国阴山—燕山地震带有关，此外武清、静海、宝坻等地也间有发生。从地震灾害来看，天津本土地震造成的灾害主要集中在房屋倒塌或损坏，人员伤亡较少，但天津周边的1679年三河—平谷地震和1885年渤海地震等地震，给天津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字林西报》（英文），1888年6月28日。

[2] 《天津直报》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3] 《申报》光绪十四年戊子五月初十日。

[4] 《字林西报》（英文），1888年6月20日。

明清天津地震是我国地震灾害的缩影，其相关记述也展现了古人对地震灾害认知的沿革。明清以前，由于自然科学知识水平的局限，古人往往将地震与政治得失挂钩。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外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教自然科学知识，古人对地震灾害的认知和记载更加科学、客观。特别是随着清朝末期报纸等媒体的蓬勃发展，能够让人们更加迅速、更加广泛、更加详细地了解到地震的真实消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人开始将地震作为一项自然现象开展研究，“地震预防”的理念也开始逐渐普及。特别是人们开始通过前兆观测地震，《重修隆德县志》记载了地下水、海水、地光、气象等方面6种地震前兆异常。此外，古人还通过提高建筑抗震性能、加强日常粮食储备等方式，预防和应对地震灾害，为后世抗击地震灾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 参考文献：

- [1] 天津市地震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地震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
- [2] 李庆勇：《明代福建地震时期分布分析》，《黑龙江史志》，2019年第10期，第45—48页。
- [3] 田帅宝：《清康熙十八年（1679）三河—平谷地震及赈灾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22年。
- [4] 刘瑾：《从方志看明代广东地震的时期分布》，《兰台世界》，2021年第5期，第136—143页。
- [5] 任晓兰：《论明代地震灾异与地方治理——以嘉靖乙卯陕西大地震为例》，《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15—117页。
- [6] 张立昕：《明清时期安徽地震研究》，淮北师范大学，2018年。

（作者单位：市地震局）

# 英美烟公司在天津的广告活动

曲振明

在天津迈入近代化之际，英美烟公司的广告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对天津地方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广告文化与社会文化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文化决定了广告文化的内涵，而广告文化反过来又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笔者结合史料将英美烟公司广告在天津的广告活动整理并叙述如下：

## 一、英美烟公司在天津的广告业务

1902年，跨国烟草托拉斯企业英美烟公司进入中国后就在天津开展业务。鉴于天津在北方的政治、经济地位，英美烟公司十分重视这里的业务发展。

英美烟公司在津业务，最初委托美商老晋隆洋行代理。1912年，在俄租界四号路（今河东路李公楼立交桥附近）设立办事处。1919年2月，驻华英美烟公司在上海成立，收回老晋隆洋行经销权，在中国设16个销区，下设上海部与天津部，其中上海部负责12个销区，天津部下设北方、芦汉、山东、蒙疆4个销区，覆盖天津、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外蒙（今蒙古国）、山东及辽宁等地区。1919年、1922年分别在俄租界哥洛司托夫路（今六经路嘉里中心）设立华北最大的卷烟厂（也是天津最大的外资工厂）与天津第一家胶印厂。这两家企业，在天津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了推销卷烟，英美烟公司十分重视广告宣传，在天津部内设立广告部，雇佣50多名专

职人员，广告费用庞大而惊人。其广告的种类极多，一般有报纸广告、杂志广告、电影广告、广播广告、路牌、流动广告、传单、油漆牌子、胶印月份牌广告画、卷烟画片等。

除上述广告外，英美烟公司还有五花八门的赠品广告，贵重的如铜床、手表、怀表、金戒指等；普通的如布匹、雨伞、丝袜、香皂、肥皂、手巾、镜子、钱夹、烟缸、烟盒、烟嘴、火柴等日用商品。

广告在于出新，英美烟公司认为，“广告之术，现最发达、虽穷乡僻地，满墙满壁，遍粘招徕之广告，遂往往为人所忽视。鄙意广告须能使人人注目，必须新颖之法。如黄包车之背上，行驶内地之舟，皆可作广告。又轮船及火车亦佳，此法已有日行之者。日记簿及旅行各具，最易动目。又报上之广告，须含游戏及美术性质，则观者悦而读之矣”<sup>[1]</sup>。



海河边上的英美烟公司天津工厂及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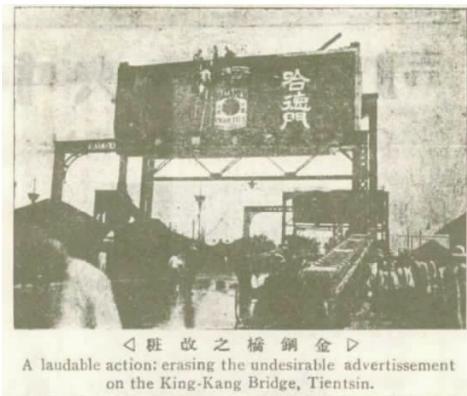
英美烟公司的广告光怪陆离，在天津中原

[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第701页。



公司楼顶、劝业场的霓虹灯、天津总站的路牌、鼓楼的涵洞以及老地道的过梁上都出现过。这些在天津标志建筑上出现广告，很容易引起市民的注意。

1924年金钢桥新桥启用后，吸引了众多天津人到这里聚集观望，遂引起英美烟公司的重视，并与市政当局接触，在金钢桥新桥头上做香烟广告。由于新桥花费50万元工程费，“当日之省政府为一时之利起见，竟允许纸烟厂大登哈德门广告于其上”<sup>[1]</sup>，金钢桥河北段曾是清代直隶督署衙门、民国后的河北省政府所在地，桥头描绘过五色国旗。这里是地方政府势力的标识，出现香烟广告有碍观瞻，立即遭到中外绅士热议，纷纷在报上发表评论对这种行为进行抨击。对此，冯问田《丙寅天津竹枝词》诗载：“重建金钢新铁桥，香烟高悬画商标。若非舆论时攻击，广告谁能立取消。”<sup>[2]</sup>记述了舆论对哈德门广告的非议。1926年9月，迫于市民压力，哈德门香烟广告被迫涂抹下去。



1926年《北洋画报》刊登涂抹广告的图片

英美烟公司对天津京剧热十分关注，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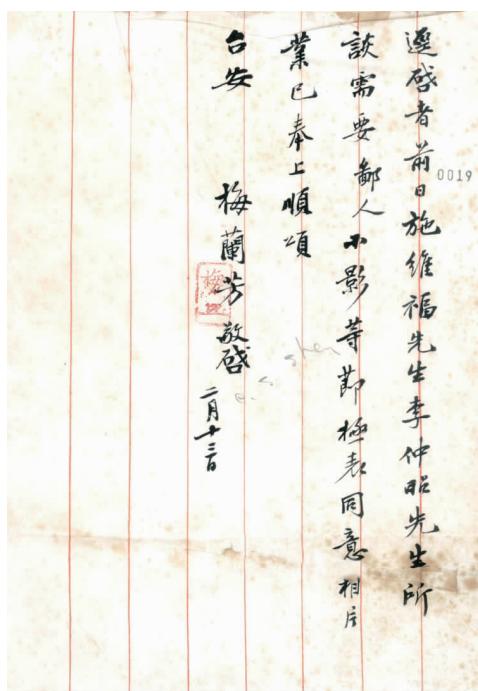
迎合广大戏迷兴趣，在著名须生马连良应邀到中国大戏院演出时，包下广播电台向各地转播的时间。电台一边播放马连良的《借东风》，中间插播哈德门的广告，颇为轰动。此次成功后，英美烟公司又改播梅兰芳、杨宝森等名伶的演唱，据说“拿出300箱哈德门香烟，折价约梅兰芳、杨宝森这两个剧团的资本。大概按那时市价核，每箱得1300万（法币），连乱七八糟的算起来，要到70多亿（法币）”。在名伶演出中插播广告取得较好的效果，却也受到媒体的非议。北平《一四七画报》刊文讽刺，标题为《三百箱哈德门烟作本钱，折腾梅博士演出一个月》<sup>[3]</sup>。

英美烟公司还在烟盒中附赠画片，俗称“毛片”，一面为彩画，一面为广告。毛片是成套的，具有收藏功能，但厂家为了促销，个别画片故意少印，以吊起收藏者的胃口，促进卷烟销售。梅兰芳最初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广告，专门设计了《梅兰芳》牌卷烟，颇受轰动。后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印制第一枚梅兰芳毛片《葬花》，那楚楚动人的造型，让设计者忘记了他的性别，使之与名媛淑女一起印成一组，冠名《中国妇女照》。据说，当年梅兰芳对此颇为不爽，以致此后十余年间，从未让卷烟商印制毛片广告。1931年，天津报人沙大风发起四大名旦评比，英美烟公司天津广告部负责人英人施维福通过经纪人李仲昭的说项，梅兰芳先生同意英美烟公司使用肖像权。后来，印制了《梅兰芳便服肖像》和《嫦娥奔月》《天河配》《天女散花》《洛神》《天真外传》《廉锦枫》等剧照。

[1] 《北洋画报》，1926年9月26日。

[2] 冯文洵：《丙寅天津竹枝词》，紫萧声馆，1934年8月，第25页。

[3] 《一四七画报》，1948年5月11日，第10页。



梅兰芳给英美烟公司的回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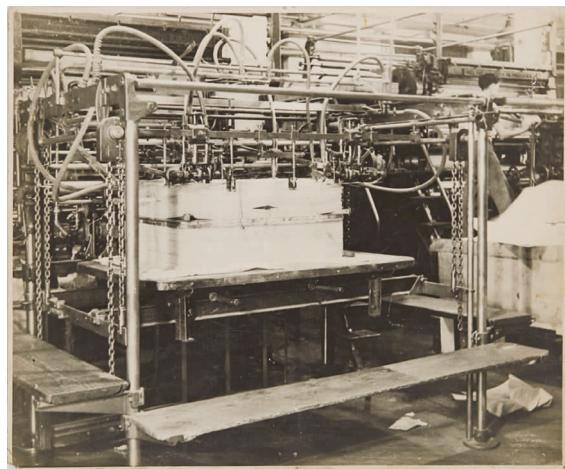
英美烟公司广告宣传涉及方方面面，不仅利用公众事业的影响、名人的影响以及新生事物的影响，扩大商品的广告宣传范围，而且对天津的文化事业有直接影响。

## 二、月份牌广告与天津年画

天津是年画的主要产地，以杨柳青为代表的木版年画描绘着中国传统历史故事、戏出人物、民俗风情等等，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

英美烟公司为了传播商品，销售时附带一些广告画。这些广告画印刷精美、色彩鲜艳、绘制逼真。与之相比，传统的年画用宣纸、草纸、粉连纸刷印，显得题材传统，画面粗糙。这些广告画的出现，严重地冲击了天津的传统年画市场。1949年8月，画家邹雅考查天津年画市场，在《进步日报》发表文章《年画调查》一文，称“天津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以销售杨柳青木版年画为主。后来英美烟公司石印的

美女月份牌广告画进入市场，天津年画业也改用石印年画”<sup>[1]</sup>。中国人最早用黄历纪年，清代末年，出现了阴阳历合一的月份牌，渐渐成为各个家庭的必备品。外国商人看重月份牌的作用，往往附在商品广告画上面，形成了月份牌广告画。这种画一般上下有金属铁片，还附有挂绳，方便保存与悬挂。据说20世纪20年代开始，各大银行、公司、商场都要印制一些月份牌广告画赠送客户。最早月份牌广告画是保险公司和各大报馆发行，由于印刷粗糙，并没引起人们重视。后来，英美烟公司进入中国后，印出的广告画十分精美，受到世人欢迎。英美烟公司董事长、美国烟草大王詹姆斯·杜克重视卷烟广告宣传，在建设烟厂的同时，还附设印刷厂印制卷烟商标、制作广告宣传品。1921年，英美烟公司天津工厂开工的第二年，就在建成胶印厂装置了当时最先进的彩印设备和全套的照相制版设备，为印制精致的月份牌广告画和烟画片奠定了基础。



英美烟公司天津印刷部胶印机

英美烟公司印制发行月份牌广告画以及烟盒内的画片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天文、地理、

[1] 邹雅：《年画调查》，《进步日报》，1949年8月8日。



人文故事无所不包。后来，月份牌以美女画像为主，这些风情万种的美人，以现代生活为背景，经过著名画家的传神刻画，颇受欢迎。早年天津英美烟公司印制的月份牌广告画，画稿来自上海驻华英美烟公司总部，那里聘用一批优秀的画家，如郑曼陀、徐咏青、谢之光、杭稚英、丁云先、胡伯翔等等，其中郑曼陀的现代美女画最早，最为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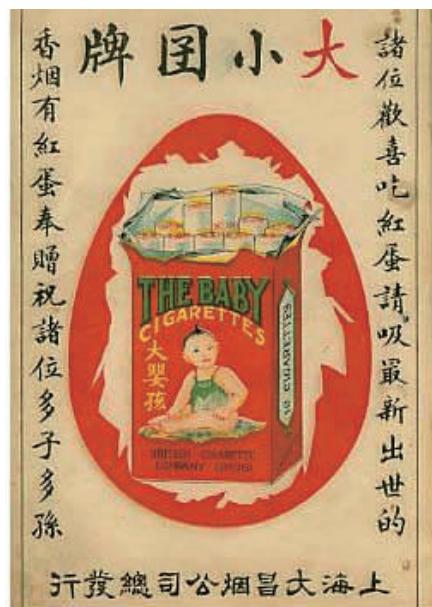


郑曼陀绘制的美女广告画

说到郑曼陀，还要谈谈富豪黄楚九。黄楚九是上海滩的显赫人物，他在经营药业和娱乐业成功之后，又把目光投向了卷烟业。

1915年，黄楚九投资大昌烟公司，生产“小国”“五福”“大中国”等牌香烟。这款“小国”也称“大婴孩”，后来一直在天津生产。上海人称婴儿为“小囡”，黄楚九推出了“小囡”牌香烟，并将广告效应发挥极致。1917年，黄楚九在上海各大报纸第一版刊出广告。画面只是一枚套红的大红鸡蛋，这个广告引起

人们的好奇，着实让大家费了脑筋。两天后，各大报纸同时刊出广告，大红鸡蛋中衬托着“小囡”卷烟，两边写着“诸位欢喜吃红蛋，请吸最新出世的大小囡牌香烟，有红蛋奉赠，祝诸位多子多孙”。新颖的广告利用人们生小孩送红鸡蛋的风俗，扑朔迷离，吊起大家胃口。这一奇特的广告构思震惊了大上海，也刺激了“小囡”牌的销售。这一做法，让英美烟公司赞叹不已，于是斥资20万元买下“小囡”牌商标的使用权，从此黄楚九与英美烟公司成为合作伙伴。后来，英美烟公司把“小囡”拿到天津生产，改名为北方人的称谓习惯“大婴孩”，图案是一位穿着红兜兜的小孩，梳着朝天杵的小辫。“大婴孩”香烟在天津可谓家喻户晓，但其轰动一时的广告却鲜有人知晓。



《小囡牌》卷烟广告

黄楚九不仅有商业头脑，还善于发现人才。郑曼陀为杭州人，最初在杭州二我轩照相馆，绘制炭画人物肖像，这种画也称擦笔画。郑曼陀能使用多种颜色的炭粉绘制，往往以美女为模特，图画明丽鲜艳。郑曼陀在杭州的生活并

不景气，后来随哥哥来到上海，在一个市场绘画兼卖画。一天，黄楚九路过市场，一眼发现郑曼陀的四扇屏美女画，随后把郑曼陀介绍给英美烟公司。由于英美烟公司财力雄厚，请来电影明星和戏剧名角为模特，再加上世界一流的印刷设备，从此美女画风靡一时。

胶版月份牌美女画引起天津商人的重视，不仅吸收月份牌广告画的绘画技法，还购买英美烟公司淘汰的印刷设备。不仅印制月份牌广告画，还印中国传统的年画。此后，胶版美人画“一时占领了整个华北年画市场，至此木版年画就一蹶不振了……”<sup>[1]</sup>1920年至1930年是天津胶版年画最繁盛时期，富华、华中、毓成、万盛、同和等一批年画印刷商控制了华北、西北、东北的年画市场。

### 三、英美烟公司电影部与天津早期电影

1921年，驻华英美烟公司董事会通过发展电影广告的决议，于是着手筹备投资中国电影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23年在上海正式成立电影部。随着业务的开展，英美烟公司电影部相继在天津、汉口、香港成立分部。

天津电影部设在位于河东大王庄的英美烟公司天津部内。为了迎合观众口味，最初的影片多为各地风光、体育比赛以及介绍名媛淑女社交活动的纪录片，中间穿插一些电影广告。后来，英美烟公司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兴趣，拍摄表现中国戏剧和使用中国话的电影，聘请中国著名导演管海峰及上海、香港、广州等地演员拍摄了一些故事片。1925年，英美烟公司电影部拍摄的故事片有《空门遇子》《柳蝶缘》《慢慢的跑》《名利两难》《三奇符》《神僧》《心病专家》《遗产毒》等。



英美烟公司拍摄的古装片《柳蝶缘》剧照

由于拥有进口的摄像机和摄影设备，他们拍摄了比中国其他电影公司更多的镜头。根据詹森开列的目录，拍摄了包括191卷100英尺的有关城镇的题材、59部单卷风景片、15部单卷教育片、6部双卷喜剧片和4部故事片。所有电影都是为了促销卷烟，为此每部电影中每一处镜头的副标题下，都印上英美烟公司各种牌号的卷烟。

天津电影部由英国摄影师岳塞负责，主要拍摄华北地区的趣味新闻、北洋军阀在北京的各项政治活动以及各地风土人情等，其中有《蒙古真相》《北京张家口古景》《临城大劫案》等。当时最著名的新闻片是《每周新闻》，专拍华北各地新闻趣事。天津各家电影院纷纷向英美烟公司电影部订租，十分受欢迎。

英美烟公司从拍摄广告电影片看到电影不仅能为宣传香烟服务，而且获得丰厚的利润，便产生发展电影事业、控制中国电影放映市场的想法。此后，一方面改变最初拍摄纪录片的方针，开始拍摄故事片与其他影片公司竞争；另一方面收购电影院，以控制放映市场。此后，英美烟公司从上海、天津开始收买或自建电影院。

[1] 宋洪升、王开元：《解放前杨柳青年画史略》，《津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90年12月，第30页。



1923年，英美烟公司建造并拥有了上海奥迪安大剧院。随后，收买了“闸北”“大英”“新芳”“宝兴”“自由”5家电影院。1924年11月1日，由天津英美烟公司出资的“三炮台”电影院开业。《英美烟公司月报》记载了当日的盛况：“开幕之日，观客极为踊跃，后至者竟无座位。”<sup>[1]</sup>前大总统黎元洪及夫人危文绣等天津名流应邀出席。当天放映新闻片《天津赛马》，黎元洪与在座的许多名人被摄入镜头，到场观众被“自己之现身银幕”惊呆了。

“三炮台”是英美烟公司的高档卷烟牌号，以此命名影院本身就带有广告性质。“三炮台”电影院位于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其来历颇有故事。福岛街上最早的影院是中日合资的天津电影园，开办以来颇有起色。数月后，与天津电影园遥遥相对，盖起一座日本人独资的明星社电影院。该影院设施豪华，“夏有电扇，冬有电炉”，放映欧美流行的经典影片，吸引天津中外上流人物前来观看。相比之下，天津电影园较为逊色。日本人建明星社电影院就是与天津电影园竞争，同样的影片，票价仅为天津电影园的三分之二。由于当时社会上抵制日货风起云涌，各大报纸拒绝刊登日资广告，明星社电影院开业不久便告倒闭。后由上海一家影片公司经营，不满半年又转租给平安电影公司。平安电影公司增加了中文字幕，并联络各大报纸竭力宣传，也未能挽救颓势。1924年冬，由天津英美烟公司出资接办，改名“三炮台”电影院。

“三炮台”电影院着眼点在香烟广告宣传，借助自己的电影公司便利，有许多翻新的花样。

[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第709页。

[2]《申报·电影新闻》，1925年1月6日。



1925年《新天津报》三炮台影院广告

1924年12月24日，放映美国喜剧电影明星哈罗德·劳埃德主演的惊悚喜剧片《永不软弱》。当时，劳埃德以“罗克”之名风靡中国，与卓别林一起享有盛誉，给中国观众带来难得的人生欢乐。这部影片第一次在中国上映，当晚由英美烟公司天津电影部在“三炮台”电影院门口及内部同时拍摄新闻纪录片，凡是前来观影的观众均被摄入镜头。而这部新闻片只在“三炮台”放映，为此观众比平日多了许多倍。

“三炮台”放映的影片为促销卷烟服务，票价十分低廉，分成3角、2角、16枚铜子、8枚铜子四种，还有抽奖赠送香烟。如一等奖赠“三炮台”、二等奖赠“哈德门”，有时索性以卷烟替代电影票入场。《申报》驻津记者朱晓美评论“三炮台”影院，“影片既不讲究，顾客乃亦无多。此院本是广告性质，不计较营业之盛衰也”<sup>[2]</sup>。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英美烟公司

拍摄的影片受到抵制，迫于压力，公司被迫放弃在中国的电影事业。1926年，英美烟公司将“三炮台”电影院转让于上海新人影片公司，原址更名为新人电影院。英美烟公司电影部也卖掉所有摄影设备，停止了电影的经营。

#### 四、英美烟公司广告与天津媒体发展

英美烟公司进入中国以后，纸媒刚刚兴起，为此注重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广告。纵观天津早期各大报纸，都争先刊登英美烟公司广告。早期报纸广告形式较为简单，后来不仅图案新颖，还有一些文字说明。由于报纸杂志不断增多，一些媒体千方百计地争取获得英美烟公司这样企业的广告支持，其中《庸报》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报界奇才董显光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回国后在多家报纸任编辑。1925年3月，董显光与王鏗冰在天津创办《庸报》。报纸开办并不顺利，为争取资金的支持，董显光专程拜访了天津英美烟公司总办柯深史。当时英美烟公司经常在《大公报》《益世报》做广告，很少在《庸报》这样的小报上花钱。由于柯深史是美国人，董显光有留美的经历，二人自然有许多话题，渐渐成为朋友。柯深史同意每月给予《庸报》500元大洋的资助，时间为一年。不久，柯深史调到上海担任驻华英美烟公司董事长。

柯深史的继任者克特珍也是一位美国人，董显光照例到天津英美烟公司拜访，也逐渐成为朋友。

英美烟公司的资助费用是事后结算，转眼就是一年。当要付给《庸报》6000元大洋时，

英美烟公司广告部对报纸做出评价：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庸报》一定要失败的。即便我们给予支持，报纸并不盈利。但对《庸报》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认为“该报纸的编辑是好的，出版也是好的，同时在一部分有影响的人民中拥有读者”<sup>[1]</sup>。克特珍也希望今后继续给予支持，但每年6000元的广告资助，需要上海总公司董事会决定。



1926年《庸报》“大前门”广告

此事，董显光原准备等到柯深史来津面谈。后得知其不来了，于1927年5月写信给柯深史，说“如果英美烟公司继续给予帮助的话，我相信再过一年该报将能自给。如果你能够使英美烟公司再给予支持一年，我将有可能使《庸报》成为中国的一家大的日报”<sup>[2]</sup>。

柯深史、克特珍看重友谊，也判断《庸报》有好的发展。此后英美烟公司又连续几年给予广告支持，使《庸报》每天销售2万多份，与《大

[1][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12月，706页。



公报》《益世报》一度列为天津三大报纸之一。

英美烟公司除了支持天津本地媒体外，还自己独立创办刊物。

公司进入中国不久，就创办了《北清烟报》。北清是外国人对清帝国北方一种称呼，该报创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英美烟公司发行、上海群益印刷局编译承印。目前上海图书馆保存《北清烟报》第三期，该期印制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七月（1906年9月）。开办《北清烟报》的目的是帮助公司开辟一个新的卷烟销售领域，即在清王朝的中心华北一带推销卷烟制品。

随着天津作为英美烟公司在华北地区中心地位的确立，1921年又创刊了《英美烟公司月报》。主办单位为驻华英美烟公司，编辑部最初设在驻华英美烟公司天津部，设有三名编辑，由天津北洋印刷局承担印刷。《英美烟公司月报》主要刊载卷烟销售状况，宣传文字与广告；辅以烟草生产方法、卷烟制造、国内外经济贸易介绍，以及公司职员、经销商与顾客、代理店的信息参考与友谊联络；另有文艺小说、杂俎趣闻、卫生常识等，以供读者消遣。

1923年9月1日，即英美烟公司成立21周年之际，《英美烟公司月报》出版一期纪念刊。该纪念刊介绍了驻华英美烟公司概况，特别是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以及公司各位董事介绍，还介绍了驻华英美烟公司天津部、上海部以及16个销售区域的组织情况、经销代理商情况，大量的铜版纸图片以及刚刚建成的天津工厂的照片。



1923年《英美烟公司月报》纪念刊

该纪念刊还专门介绍了《英美烟公司月报》，称“《英美烟公司月报》系本公司正式通讯机构，月出一期，创办于北京，设于本公司学校内。该校之目的原系谋公司华职员之便利，而为公司教育计划之一。月报第一册于1921年正月出版，直至是年12月俱系在京印行。1921年2月，编辑部迁至天津部总办公处，受该部广告部监督，自2月在津出版。自此改组以来，各地同人纷纷来函称誉，是证该报之为同人所注意。该报刊仍力求改良，每月增加新材料，以冀对于诸同人有实际之利益云”<sup>[1]</sup>。

英美烟公司作为西方在华企业，重视自文化入手的广告宣传，也对天津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广告文化效应促进了商品的销售；另一方面，广告的支持也带动了文化进步与发展。

（供稿单位：河东区地方志办）

[1] 《英美烟公司月报·纪念刊》，1923年9月1日。

# 辛亥革命前天津出版概况

张 岩

中国图书的出版，自唐朝以来一直使用雕版。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但由于活字印刷对排版工人素质要求较高，成本大，始终没有成为印刷业主流，主要用于官方编纂出版的图书。因此，雕版印刷直到鸦片战争前始终是我国印制图书的主要手段，并形成了官刻、私刻和坊刻三个系统，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苏州、扬州一带。

## 一、暂露头角的图书出版业

天津的雕版印刷业起步较晚，1404年明廷设卫后，天津开始进入城市阶段。由于经济、文化基础薄弱，当地作者少，出版事业处在萌芽时期，刻书也多为地方志。明初，官刻《蓟州图志》出版，这是已知天津境内最早的版刻图书。此后，官刻书籍不绝于缕，除《蓟州志》（明宣德年间、成化十四年、嘉靖三年、崇祯元年）外，尚有《宝坻县志》（弘治十四年、嘉靖四十五年）、《天津三卫志》（正德十四年）、《长芦盐法志》（嘉靖十年）、《武清县志》（万历二十年）、《长芦鹾志》（万历年间冷宗元纂修，长芦都转运盐使司刻印）、《静海县志》（天启七年）、《天津三卫屯垦条款》（天启年间）等多部志书付梓出版。

同时，私人刻书也开始在坊间流行。明毕自严著《抚津疏草》、汪来著《北地记》<sup>[1]</sup>是已知天津最早的私家刻书。另有正德年间蒋仪（北直隶天津右卫军籍）撰《医镜》和《药镜》

四卷、嘉靖年间张愚著《蕴古书屋诗文集》、万历年间刘焘撰《蓟辽奏议》等。但因原书、版大多佚失，是否为天津所刻，待考。相传形成于嘉靖年间的杨柳青年画，至万历年间已在民间广泛传布。



清初官刻主要是朝廷刻书，地方政府刻书很少。清中后期，官刻改为以地方为主。同时，天津作为京师门户的地位得到加强，城市的行政功能逐步完善，文化教育事业大为改观。官修志书，诸如府志、县志、图志、盐法志、河渠志代有迭修刊刻出版。

这一时期，天津地方私刻书籍呈现出别开生面的繁荣景象，尤其是天津盐商的介入，形成版刻业独特的盐商文化特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康熙时期的天津大盐商安岐。安岐是天津历史上第一位金石书画、文物图书的收藏家、鉴赏家和刊刻家。其所撰《墨缘汇编》四卷和刊刻的《书谱》闻名于世，也是天津最具全国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安

[1] 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存目》。



岐从真定梁清标处得唐孙过庭《书谱》墨迹。康熙五十年（1711）安氏访得苏州摹勒高手顾嘉颖、顾锡韩父子，延至天津，先行木刻，而后上石，至五十五年（1716）七月十六日告成，刊行天下，影响巨大。

据文献可考，天津文人著述迄止咸丰年间刻本达二三百种之多，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如：《玉虹草堂集》（尤震著），《诗礼堂全集》（王又朴著），《津门杂事诗》《沽上题襟集》（汪沆著），《莲坡诗话》《蔗塘未定稿》《昨非斋草》（查为仁著），《绝妙好词笺》（查为仁、厉鹗笺注），《墨缘汇观》（安岐著），《津门诗钞》（梅成栋编），《蠹言集》（华长卿著）等。其间，杨柳青年画的制作与销售也达到鼎盛时期。天津的出版业呈现繁兴势头。

近代印刷术发明以后，1810年代开始，西方传教士所经营的传播机构在南洋、港澳等地建立据点，马六甲与新加坡先后成为中文书刊的两大中心。而中国境内对各种传教机构及印刷品给予极大的限制。1810年，清嘉庆颁布谕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构，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斩。”<sup>[1]</sup>但清廷的高压政策，并没能阻止海外印刷品通过夹带、邮寄、免费分发等多种方式走私入境影响沿海一带。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势力逐渐扩大，各种传教机构及近代印刷技术开始进入广州、福州、宁波、上海等口岸，乃至政治中枢的天津、北京，为中国出版业的繁荣

带来了新的契机。

由于太平天国长达十四年的战乱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藏书古籍多毁于兵燹，雕刻书版和私家藏书多化为灰烬。同光年间，在政府的鼓励和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中兴名臣在南方设局刊书的影响下，各省纷纷建立官书局，刊刻谕纂、钦定经史各书，成为晚清时期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所谓“官书局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sup>[2]</sup>。

在版刻方面，天津周氏师古堂、金氏屏庐、徐氏退耕堂三家私人刻书著称于世，各具特色。周氏以课艺时文为特色，金氏以家集、乡邦文献为特色，徐氏则以部头大、品种多为特色，成为天津私家刻书的代表。

光绪七年（1881），天津府南皮县知县劳乃宣向李鸿章建议筹借款项，在直隶设局发卖南方书籍，以“嘉惠学者”。经总理省城修志局复查后，李鸿章认为，三四千两作为成本“恐不敷周转，自应酌量宽备”，并交省城炼局、天津支应局“迅速妥筹”<sup>[3]</sup>。嗣后，李鸿章于1881年、1882年分别在直隶省城保定和天津设立运书处（即后来的直隶官书局），购运南省书籍，“将来运到时，省城即在志局发卖，天津交支应局发”，“志局”即莲花池畿辅通志局，经理保定直隶官书局；天津直隶官书局由支应局经理，发售地点在问津书院。两处所售书籍“划一不二”，原价发卖。官书局经营书籍，一为经史子集、诸子文集类；二为西学书籍，其中以上海制造局所译西书为主，也有少量国人自著的西书和经世类的书籍。

[1]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9页。

[2] 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3] （清）畿辅通志局：《直隶官书局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史料丛刊（第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除了运售南方各省书籍外，直隶官书局也从事一些时务书籍的印售（一说委托其他书局刊印），并分售各省。1886年，天津官书局编印《通商条约类纂》，编辑整理通商约章类纂三十五卷。1907年，天津官书局出版发行日人梅谦次郎著，黎炳文和李栋译述《汉译民法讲义》。1908年，由北洋官报局印刷、天津官书局发行涂景瑜著《中国监狱史》一书，是中国第一本关于监狱史考察的著作，也是中国法制通史中的一部专史。这些书籍的内容多与西学和新政有关。除天津官书局外，天津机器局、北洋武备学堂、天津丙午社、北洋官报局、北洋陆军编译局都曾从事过西学书籍编译出版。

辛亥革命前，天津陆续成立了直隶官书局（后改直隶书局）、文明书局、日新书局、孟晋书局、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利亚书局、教育图书局、南洋书局等几十家书局，这些书局大多集中在大胡同、北马路一带，除销售书籍外，有的也出版图书。此外，天津的一些报馆、宗教团体、私人印书也占相当比重。

总体来说，辛亥革命前天津近代图书出版业不够发达，对出版业经济投入较少，译著作队伍没有形成规模，出版单位力量薄弱，对全国出版业的影响力较低。

## 二、北方报业中心的初步形成

从1860年开埠近三十年后，天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对外交流、贸易的中心，外侨聚集，已经具备了创办近代报纸的条件。

首先，19世纪末整个世界范围内报刊业逐渐走向成熟，将中国北方地区纳入报纸发行范围是必然趋势。其次，西方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尤其在科学技术领域突飞猛进，印刷

技术的快速高效，为报纸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可能。再次，天津租界内、外开放的大环境为报刊创办提供了思想氛围。最后，开埠后天津租界外侨对社会、商业信息的需求为报纸的发行提供了市场。

天津最早出现的报纸是1880年至1881年由海关港务部长洛维特主编的英文报刊《北方邮报》（1880—1881），但这份非商业时事性报纸主要公布海关贸易记录与往来船只统计，社会影响很小，不属于近代传统意义的报纸。

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下，1886年（光绪十二年）11月6日，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与怡和洋行经理宓吉（Alexander Michie）在天津英租界成立天津印刷公司（Tientsin Printing Company），创办《中国时报》，又称《益闻西报》。该报由宓吉担任主编，天津印刷公司还同时创办了附属于《中国时报》的天津第一份中文日报《时报》（1886—1891）。许多在中国教育、商业史上有深刻影响的在华外国人都曾为这家商报纸撰写文章，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英国传教士殷森德（John Innocent），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等。1890年，应李鸿章之约，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担任《中国时报》中文版《时报》主笔，经常发表呼吁和引导清朝改革的社论。该报在1886年至1891年间连续发行，是逢周六出版的周刊，主要在租界内发行，共发行216期。对当时社会造成很大影响的《时事新论》一书即为集报中论说而成。

《中国时报》是在天津创办的第一份面向所



有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懂英文的中国有识之士的近代英文报纸，其内容是综合性的，不限于宗教信仰传播、不限于专门数据统计，具备了近代报刊新闻、言论、文艺、广告四个要素，《中国时报》的创办标志着天津近代报业发端。

1895年11月26日，德国人汉纳根创刊《直报》。该报是继《时报》之后在天津的又一家外国人办的中文大报，杨荫庭主持编辑业务。《直报》创刊之始，曾连续发表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辞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和他的政治改良主张，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增强国民体质，禁止缠足及吸食鸦片；“开民智”就是废八股，讲西学；“新民德”就是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由于这些文章是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和强学会两份报纸出版前发表的，影响巨大，《直报》的知名度随之提高，严复也因此名噪一时。1904年，因载袁世凯所属部队溃散叛变消息，被袁查禁。同年6月，《直报》改为《北洋商报》出版，8月停刊。

戊戌变法前后，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发展到高潮，为了适应变法和社会的需要，资产阶级报刊开始大量涌现，出现了中国近代报业的一个高峰。

1897年10月26日，在维新派办报热潮的推动下，严复与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育才学堂总办夏曾佑、内阁中书杭辛斋等人集资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大力鼓吹变法维新。《国闻报》为日报，每日印一张，计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约八千至一万字，“首登本日电传上谕，次登路透电报，次登主笔人论说，次登天津本地新闻，次登京城新闻”，然后是华北各地新闻及外洋新闻。至于东南各省新闻，

“东南各报馆言之甚详，本馆一概不述”。《国闻报》发表的宣传维新思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社论”和“来稿”部分，前者共42篇，约半数以上为严复所作。《国闻汇编》为旬刊，十日印一册，约计三万言，采用三号铅字排印。旬报内容以重要消息及论说译文为主，尤“详于外国之事”。由于旬报只出版了六期便停办，严复的许多政论文章改在日报发表。

严复以为，“塞于下情国必弱，昧于外情国必危”“以通外情为要务”。因此，《国闻报》自创刊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对外国报刊、书籍的翻译介绍工作。他们不惜重金聘请懂得英、法、德、日文字的翻译人员，大量译载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外电、外报的消息和评论。

该报规定除京、津、华北地区的新闻外，东南各省新闻“一概不述”“消息确而速，又极多极详”。《国闻报》曾用大量篇幅报道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的消息，发表了康梁在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并配发评论为其叫好。“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的全部诏书及维新派大臣的各项条陈也都在《国闻报》全文发表，全力配合维新变法，对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变法言论进行追踪报道，并以《总报局告白》的形式大力推介维新论著。《国闻报》经常发表政论性文章，鼓动维新思潮，倡导“君主立宪”，这些文章不仅大力宣传中国已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刻，必须通过变法以救亡图强，而且所论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政治、外交、教育、商业、学术等，倡导实行君主立宪、发展实业、改革八股、联日抗俄等，形成以严复思想为主导的舆论中心，除在保教等少数问题上与康、梁存在不同意见外，整体上保持一致，有力推动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1897年12月18日起，旬刊《国闻汇编》以连载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标志着其传播模式突破了人际关系的限制，而发展到大众传播，这显然是一个重大转折，是进化论风靡全国的真正开端，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国闻报》的创办是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和《时务报》南北呼应，构建了强大的舆论网络，成功冲破了清廷的言论禁锢，夺回了由外人掌控的话语权，开启了政论报刊的黄金时代，使报刊成为思想表达不可或缺的平台和大众传播形式的主流。当时，《国闻报》是“北方报纸之最佳者”<sup>[1]</sup>。

1897年底，在创办五个月后，因连续报道胶州湾教案与旅大事件，俄国政府勾结清政府亲俄力量意图干涉《国闻报》。迫于压力面临停刊威胁，同时也鉴于上海《时务报》收归官办的教训，严复和王修植决定采取迁址、匿名等措施，并于1898年3月在“告白”中声明“出盘”日人西村博，出版日期改为明治纪年，来规避清廷的追究。由此，《国闻报》得以暂时生存，并在戊戌变法期间成为报道最翔实的媒体<sup>[2]</sup>。

戊戌变法慈禧太后复政后，谕旨封禁各报馆：“莠言乱政，最为声民之害……近闻天津、上海、汉口等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枉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sup>[3]</sup>官方对传播媒体严厉查禁，各地创立的学会报

刊纷纷停歇，留下来的几乎都在租界。1899年，中文报刊的创刊数由上一年的52%，骤降至18.2%。同年，除上海、海外等地以外全国创刊的期刊只有6种，其中2种是天津租界的商业刊物。

《国闻报》虽已假手日方得以幸免，但由于清政府的压制，经营也陷入困境。1899年4月29日，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等人斡旋下，以1.1万元的价格卖给日本外务省。其后，《国闻报》因发表有关光绪帝废立的文章与清廷发生龃龉。1900年4月30日，日本外务省曾下达“卖却”的命令，但在义和团事变之际，报社为战火所焚而自动停刊。后该报社长西村博与该报主笔方若用赔款又创设了一个新报，名为《天津日日新闻》。1902年，西村博又创立了另一份日文报纸《北清新报》，因此将《天津日日新闻》的名义出让。自此以后，《天津日日新闻》实际全部由中方经营，所刊登的文章也全部用中文。由于该报实乃《国闻报》的续刊，加之西村博与康有为交厚，因而被看作是君主立宪派的报纸。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在天津租界内创办报刊成为一种潮流。如：1894年3月英国人裴令汉（William·Bellingham）创办《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英文版，1916年增加中文版）、《中华星期画报》（周刊《京津泰晤士报》副刊），1889年日本人西村博创办《咸报》，英国记者高文创办《益闻西报》（以七国文字出版，1901年1月21日创办于北京，1902年迁至天津日租界），1902年1月日本人西村博创办《北清新报》（日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社，1955年。

[2]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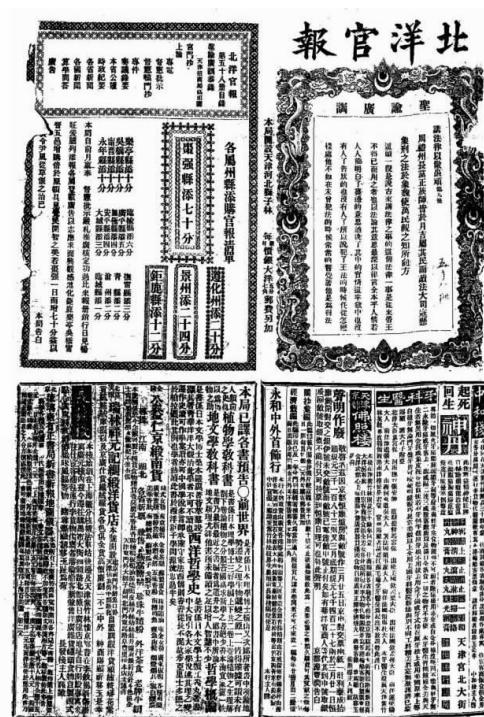
[3] 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5月。



文），1903年秋由木村竹南、小田切勇辅、丰冈保平三人创办《北支那每日新闻》（日文），1903年法国人创办《天津差报》（法文），1902年1月驻津德军在天津创办《德军报》（Deutsche Brigade Zeitung）（德文周刊），1904年9月德国人创办《中外实报》（中文报刊），1904年10月德国人劳克创办《北洋德华日报》（Tageblatt Fur Nordchina）（德文日刊），1905年（一说1915年）英国人贝特（R·Bate）创办《华北每日邮报》（North China Daily Mail）（英文），1905年（一说1915年）创办《天津回声报》（又称《权务报》法文），1918年美国人福克斯创办的《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英文）等<sup>[1]</sup>。

为扭转传播媒体与官方权威对立的局面，清廷一方面加强对报刊的查禁与管控，另一方面官方资本开始介入传播媒体。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北洋官报》，开启了晚期官报风潮。1903年，在袁世凯、张之洞等建议下，官股进入报刊。1904年后，官方势力政策性的大举进入报馆，创办“官报”已成为清政府对抗革命刊物的主要手段。

《北洋官报》是配合晚清新政运动的产物，其办报宗旨诚如《〈北洋官报〉序》中所说：“夫私家之报，识议宏通，足以觉悟愚蒙者。独期间不无诡激失中之论，及或陷惑愚民，使之莫知所守。然则求其所以交通上下之志，使人人知新政新学，为今日立国必不缓之务，而勿以狃习旧故之见，疑阻上法，固不能无赖于官报也。”<sup>[2]</sup>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北洋官报》办报宗旨，一是宣传政府的新政，“使人人知新



《北洋官报》1903年五十八期

政新学，为今日立国必不缓之务”，不使民众“疑阻上法”；二是阻止私家报纸“陷惑愚民”。借此拉开与南方《苏报》等革命性报纸的舆论战。此后，《晋报》《江西官报》《湖南官报》等各省官报相继开办，许多省级相关机构也发行专门的官报，如《直隶教育官报》半月刊（1904.11）、《天津警务官报》（1907）等等。天津北洋官报局除创办《北洋官报》外，还出版《北洋政法学报》旬刊（1906）、《北洋学报》周刊（1906）、《北洋政学旬报》（1910）等期刊，并出版印刷各类书籍。

尽管官方从1904年以后逐步经营报刊，但民间多半认为官报敷衍陈腐，订阅者少。为吸引更多读者，推广政令，1905年，《北洋官报》推出较浅显的“白话浅说”，而许多非白话

[1] 于树香：《外国人在天津租界所办报纸考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社，1955年。

的官报也刊载了相当比例的白话文章，以加强对中下层民众的文化控制。

除官报外，国内各地还涌现出一批由君主立宪派人士自行创办的报刊，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君主立宪派的这一类报刊，在北方最有影响的是京津出版的《大公报》《京话日报》。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报馆开始设于天津法租界，后迁至英租界。创办人英华（字敛之）。担任主笔的先后有方定六、刘孟扬、王瀛孙、黄与三、郭定森、樊子熔、唐梦幻等。就其性质而言，《大公报》是一份具有君主立宪思想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其在当时之所以具有相当的影响，在于其办报宗旨：敢言性、严肃性、非“牟利”性和替“劳苦大众说话”的平民性。但在政治主张方面，《大公报》从一开始，宣传的中心内容即为保皇和立宪。创刊后的第五天就刊出《论归政之利》的论说，要求慈禧归政光绪。1903年它又发表论说《论立宪之要素》，强调立宪的必要性，主张效法英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既要保皇，就自然反对革命。《大公报》公开诋毁革命党为“乱党”，认为宣传民主共和，“有拂于民情”，革命是“最危、最险、最凶、最恶、最可惊、最可怕”的事情，革命党人“必不能达其希望之目的于支那”。

由于满清政府名为立宪，违宪之事层出不穷，“至庚戌辛亥时，即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革命运动”<sup>[1]</sup>。1916年9月，英华将《大公报》出售给王郅隆。从1902年到1949

年，《大公报》在旧中国一共出版了47年，是一份在各个时期都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

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在天津出现的较晚。《民意报》和《民国报》都是1911年10月成立的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意报》由李石曾、赵铁桥、张煊、罗世勋等担任编辑，社址在法租界，以鼓吹“实行中央革命”为宗旨，不少来往京津一带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党人都以该报为秘密联络点。《民国报》由甄元熙任社长，孙炳文任总编辑，任维坤、梁漱溟任编辑，创刊不久迁往北京出版<sup>[2]</sup>。

辛亥革命前，天津还创刊数十种商业报刊，如《人镜画报》（1907）、《农学报》《津报》《天津时报》《时闻报》《多闻报》《通报》《中外时报》《北方日报》等。

### 三、新型传播媒体对社会的影响

从明代至清末，天津出版业随着明初建卫逐步发展起来，期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由明清版刻的籍籍无名到清末北方报刊出版中心，这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新技术引进、新思想传播的必然结果。

明代至清中期，国家承担的主要职责是教化和训导职责，其政治文化呈现出一种泛道德化倾向，书籍出版也以孔孟之书为主，言必谈程朱。而政治决策与国家管理也是天子、士大夫职责，与草民无关，所谓“国家之政治，惟天子主持之，惟公卿、大夫、士得以闻知，而民人则丝毫不干涉，既不能与闻国事，即职能随国家为转移”<sup>[3]</sup>“国家兴亡视为一姓之家事，与多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6月。

[3] 《论中国风俗之本于宗教》，《中外日报》，1904年1月8日。



数国民无涉也”<sup>[1]</sup>。

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石印、铅印技术以及西方科学和近代政治思想的引入，一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泰西各国，四民多能识字观书，中国惟士人读书，商人粗知账目而已。农夫百工，大都目不识丁，所以民智不如西人，亟宜有以教诲之。”民智不开，国民的集体力量就无从发挥，中国依旧会受到外敌欺侮，国家就不能文明进步，“下流社会不动，则国之程度亦终不动矣！”<sup>[2]</sup>希望通过新式传播媒体的宣传，宣扬国耻观念，动员人民御侮自强，树立国家意识与国民观念。

中日甲午战争后，新式传播媒体受到中日战争的刺激，在数量上或是质量上都有较大的变化。上海、天津等多地都创办了大量的报刊，许多声、光、电、化等新学书籍也大量出版，吸引了大批青年士子争相阅读，对这一时期形成的改革思想影响较大。

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转而打击新式报刊，采取封禁政策、查禁各报馆，访拿报馆主笔。如1901年在天津出版的《北方日报》，因报纸广告中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两语即被封禁<sup>[3]</sup>。

但官方的查禁行为，一是由于行政管理制度不健全，即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专司报刊管理的机构，而要严格实行查禁需要各级官吏行政上的配合，即使中央有谕令，如果地方官员不切实执行，查禁的效果也有限。二是由于外国租界的特殊性而收效甚微。

面对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体和由此带来的新

思想、新观念，清廷一方面试图适应新领域，维持其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吸收许多新型传播媒体带来的新观念，为了规范管理，不得不让渡一部分权力。

在经历了查禁民间私人报馆和官资官办官报失败后，中央政府颁布一系列印刷出版的法令，包括：《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报章应守规则》（1906）、《报馆暂行条规》（1907）、《大清报规》（1908）、《著作权律》（1910）以及1911年颁布的“修订报律”（此钦定报律无统一固定名称，各报刊发布时用修正报律或修定报律等名称）。这一系列法律条文重新规范了官方与传播媒体之间的关系。一是明确了管辖机构，政府得以掌握与管理各式各样印刷品复制与讯息传播的行为，也有各类条文规范其行为，保障其权力。二是这些法规对出版物之言论尺度有详细的规范与罚则。三是保障了出版者的权益。

总之，早期的天津出版在经历了长时间缓慢的发展后，随着近代印刷技术的引入，新思想、新观念也不断冲击着固有模式和旧的出版体制。从印刷技术上看，版式印刷日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石印、铅印技术。从印刷内容上看，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逐渐让位于新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印刷载体来看，线装书籍让位于大量出现的新型报刊。从某种角度看，也许正是因为古代版式印刷的不发达，才造就了天津近代北方报业中心的出版地位。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规划部）

[1] 《论国民之心理》，《时报》，1900年1月8日。

[2] 《论中国无教》，《中外日报》，1902年8月27日。

[3]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清季重要报刊目录》，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5月。

# 明清时期影响天津水稻发展因素的研究

张存信

天津种稻历史悠久，但因其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等皆有独特之处，故形成诸多特点，并对其水稻发展产生诸多方面影响。

## 一、外来人口与五方杂居对水稻发展的影响

金、元时期虽已出现了“直沽寨”和“海津镇”，但主要还是军事据点。“天津”这个称谓是明成祖所钦赐，即“天子渡河之地”的意思<sup>[1]</sup>。1952年，天津南门外曾出土一块《重修三官庙碑》，碑文上刻有“我祖父皇帝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字样。“天津”这个称谓，故已有六百余年历史。

天津旧城始筑于明永乐二年（1404），城外三卫移入城内为1405年至1406年之间。“卫”是京师与各地普通设置的一级军事组织，受各省都指挥节制，统由中央五官都督府管辖。在卫之下，设有千户所、百户所。当时每一百一十二人编为一个百户所，设百户；每一千一百二十人编为一个千户所，设千户；每五千六百人编为一个卫，设指挥制。天津有三个卫，如以兵员足额计算，则共有卫卒一万六千八百人。卫所主要目的是军事上及有关事宜，卫城还是由州、县政府掌理。卫所职能大体有三：其一，筑建城垣和戍守卫城；其二，督护漕运和搭盖仓库；其三，屯田、巡捕及其杂役。

从现有文献研究，古代天津人口有两大聚集过程。第一次高潮是，明朝设卫调有官、军二籍充实卫城。按明制，天津三卫共调驻

16800人的官、兵，其中70%屯种，30%守城，职务可世袭，并允许带家属。这些人在津定居，经繁衍，构成明代天津城居人口的主要部分。甚至“什伍中有缺者，则从籍选家人子，闽广万里，吴楚三千里，齐梁千里而来”<sup>[2]</sup>。

当时的官、军二籍，是从全国各地征调来，而且当年有档案可查，当然还有籍贯不祥的<sup>[3]</sup>，据“卫志”所载295人的籍，列表如下：

明代天津官籍295人籍贯统计表

籍隶省份	所属州县	人数	占统计人数的%
安徽	27	84	28.5
江苏	26	54	18.3
山东	26	38	12.9
河北	16	31	10.5
河南	14	22	7.5
浙江	12	18	6.1
湖北	9	14	4.7
湖南	9	10	3.4
陕西	5	8	2.7
山西	3	3	1.0
福建	3	3	1.0
江西	2	2	0.68
广东	2	2	0.68
云南	2	2	0.68
贵州	2	2	0.68
广西	1	1	0.34
内蒙古	1	1	0.34
合计	17	160	100.00
		295	

资料来源：《近代天津城市史》《天津卫志》卷二“户口”

[1] [2] 《天津卫志》卷四“艺文”。

[3] 高凌雯：《志余随笔》卷四。



明代天津城居人口来源广泛。仅官籍一项，至少来自全国 17 个省的 160 个县。故明代人所说天津“杂以闽越吴楚梁三氏，风俗不甚统一”<sup>[1]</sup>，其中来自南方种稻地区的安徽、江苏两省人口几乎占了一半（46.8%）。来自各地的家庭带来各地生活习俗及作物品种，明代天津水稻种植品种足以表明此问题。尽管这些官籍以官的身份出现，随着时间推移，加速城居人口的流动，迅速散乱零落。到清末，能上溯其宗族者仅有 10 数个姓<sup>[2]</sup>。

随着天津城市成长，农业开发，自外地流寓天津定居人口也不少，来津为官甚多，还有来津垦荒的，如汪应蛟、左光斗、徐光启等。在农业屯垦种稻做出成绩的就有多位，更重要的是军人，家属来津务农，他们在传播水稻种植技术和原籍品种中发挥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天津人口增加的第二次高潮是清代康熙之间。与明初强制性聚集不同，此次属于自发性聚集。人口迁徙是社会流动的一个表现，原因多种多样，追求改善个人生活机会或逃避理想环境等等。

天津城市人口急增原因多样。其中之一就是天津城市经济发达吸引了外地大批人来定居。清康熙时，天津“军民尚商贾患云杂还，屈指版图，土著仅什之二犹多”<sup>[3]</sup>，这次人口增加与明代不同，从外省区来的只有 10 个省区。自江南迁来的仍占半数以上，且全是自由流动而来。而北方各省尤其是附近郊县移寓人口明显增加，表明天津城市发展对周围地区引力增加，影响圈扩大了。

明清之际来津为官者，在津水稻垦殖上起的作用非同一般。

### （一）明代

袁黄，浙江嘉善人。明万历十六年至二十年（1588—1592）任宝坻县令，在任期于城关、葫芦窝、司甲坟种稻。著有《宝坻劝农书》《宝坻故书》（当时宝坻辖境含今宁河区、汉沽区）。

汪应蛟，婺源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任天津海防巡抚，派员至葛沽、白塘口勘查，认为“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必当有利”。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始买牛置器，开渠筑堤”，在海河干流右岸首先建围田种稻。乃募民垦田五千亩，为水田者十之四，亩收至四、五石，田力大兴。

徐光启，上海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先后四次来津。首次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在津屯田，亲自参加农事活，并在“南稻北移”等方面做实验，取得成功。著有《农政全书》留世。

左光斗，安庆桐城人。明天启元年（1621）任巡按直隶兼提督学政。兴修水利种植水稻，首提屯学，创屯学，习武垦稻。对屯垦童生“给以武生衣巾，授之水田百亩。每亩收租一石”，屯学兴办“人争趋如流水”。明天启元年（1621）开垦六百亩，转年开垦四千亩。

卢观象，赣县（今江西赣州）人。河间府屯田水利通判，在津倡议“复兴屯田，劝助开河”且“自捐囊资”，“身在荒田中数载”，开寇家口以南水田三千。

董应举，闽县（今福建）人。以太仆卿，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务，经营天津至山海关北务。提出“十难十利”屯田种稻。

李继贞，太仓州人。巡按天津，督蓟辽军

[1] [3] 《天津卫志》卷四“艺文”。

[2] 《天津县新志》卷 17-3，“卫官世袭表”原刊本。

饷，明崇祯十二年（1639），乃大兴屯田，“经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赋”五议，使“白塘口、葛沽数十里间，田大熟”。

## （二）清代

蓝理，福建漳浦人。天津总兵监理，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津城南垦稻田，河渠圩岸数十里，招募有经验的浙闽农人数十家分课耕种，每田一顷，用水车四部，秋收每亩三四石不等。开成蓝田，收获颇丰。人号为小江南。

怡亲王，满族人。清雍正四年（1726）设水利营田府，下设京东、京西、京南、天津四个营田局。其中京东局辖蓟州、宝坻、宁河、武清等县，天津局辖天津、静海、沧州及兴国、富国二场（盐场）。清陈仪，顺天文安（今河北文安县）人。受命领“天津局”水利营田。是年，怡亲王疏报营田成效，其中蓟州、宝坻、天津、静海、武清稻田 66759 亩，俱禾稻茂密，高四五尺，每亩可收谷五至七石不等。

僧格林沁，满族人。钦差大臣督兵大沽海口，清咸丰九年（1859），以海河西岸归有水田，日久荒废，倡捐资在咸水沽营田 3450 亩，葛沽营田 750 亩。

崇厚，兵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满族人。清同治二年（1863）修复僧亲王前在葛沽一带所垦水田，添开水沟并开新稻田一千余亩。后设屯田水利局管理。在海河干流左岸首次开稻田排地。

周盛传，安徽合肥周家围子人。淮军将领，小站稻田开垦组织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主持建选军事设施和修建马厂至新城大道。为补充军饷，总结历史开稻田之经验，创新引入新科技，开挖马厂减河，开渠建闸，引南运河水灌稻田，终使小站稻闻名国内外。

李鸿章，安徽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清光绪元年（1875）派员勘查排地，又派

军队对三渠进行疏浚，并在岔河将中河向北延伸十三公里入金钟河，引来水冲刷河道，同时向东开掘泄水河，这样三渠上下通畅，排地稻田得到发展，并支持小站的开垦。

在水田开发中，不能忘记每次开发从南方招募来有经验的水田农民，是他们把水田种植技术传给了天津人。

## 二、中外并居与农牧交错对水稻发展的影响

自古以来，燕蓟地区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争夺之地，各有胜负，占据时间长短不等。故天津为中外并居与农牧交错地区。

中外并居形成的另一原因，是近代天津租界地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侵略者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内划出一块土地作为直接管辖的租界。

自 1860 年至 1902 年，天津先后有九国租界地。即英、法、德、日、俄、意、比、奥、美（美国租界后并入英国租界）。

各国租界地北起天津城北，南沿海河干流两岸至小刘庄、小孙庄一带，据 1903 年统计，共占地 9.915 平方公里。那时天津城关面积为 6.61 平方公里。初设租界地面积超过当时天津城关面积近 50%。由于租界地多次扩张，最后面积增加到 23692 市亩，相当于 3560 多个天津城关面积。从 1860 年设立租界地到租界地全部收回的 1943 年，时间长达 83 年。（见表 1）

外国人侵占我国领土，一方面，在津外国人逐渐增多，形成中外并居，对稻米需求量增加，促进天津水稻生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租界地沿河，又有泊船码头，为行船利益，曾多方想法提高河道航运能力。

一是海河塞支强干工程：即修节制闸，潮水不再入支河，从而加大干流纳潮量。于 1898 年 8 月至 1900 年 5 月，在金钟河口陈家沟、袁

表 1 天津各国租界地概况

国籍	侵占时间(年份)	收回时间(年份)	共占时间	面积(市亩)	资料来源
英	1860	1943	83	6329	《市政甲集资料之一》
法	1861	1943	82	2800	《日本居留团统计》
德	1895	1918	23	4200	《租界历史的研究》
日	1896	1943	47	2066	《天津概要》
俄	1900	1925	25	5474	《租界历史的研究》
意	1901	1943	42	771	《租界历史的研究》
比	1902	1931	29	747.5	《天津租界地条约》
奥	1902	1918	16	1038	《天津志略》

注：资料来源是指面积数的来源，见《天津人口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美国租界后并入英国租界）。

家河口军粮城及马厂减河口西沽修建3座节制闸，用以塞支强干。塞支强干，海河干流水深增加后，对外轮虽有益，但作用不大；而在客观上对种稻意义颇大，因稻田灌溉均用沿河涨潮，潮水托起淡水灌溉，故稻田受益匪浅。

二是海河干流裁弯取直：1896年，干流因淤塞严重，抵津之外轮有7个月只能在塘沽一带停泊，不能进入天津市区租界地码头，而使用驳船转运亦不便。故旅津侨商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吁请关商总会出面，研究救治措施。转年，直隶总督王文韶亦认为有治理必要，于是与外人筹议实施裁弯取直工程，1900年至1923年共进行6次。河道发生诸多变化：一是缩短河道26.3公里。二是涨潮总量（简称纳潮量）增加约1.72倍。三是河道缩短水流顺畅，河床刷深、拓宽、断面增大。海轮乘潮航行，从河口到津码头可减少1小时。四是海河涨潮时，潮流顶托上层淡水前进，枯水季节径流少，有潮流量代替，其上层淡水可供农田灌溉之用。从农用角度出发纳潮量大，潮水顶托淡水水位就高便于提取，且可用量大。枯水季节因潮水顶托亦便于取用淡水。

天津农牧交错对稻田发展影响很大。海河左岸（北岸）至蓟县山区间是古代边防之地，

那时骑兵在边防作用大，故这个地区为战时需要有很多马场养马、放马，属军事所需，故不能开垦农田。宝坻、武清至今还有不少保留马场、马坊的地名。清代时，在海河左岸（北岸）现在的中心桥、五十间房、八堡、头道沟、中河、向阳等地建了养马场，属军事要地，不可开垦种稻，这也是海河左岸比右岸晚开垦种稻一大原因。

另外，天津为农牧交错地区，北方游牧民族骑兵较多，而中原农耕民族步兵较多，若开垦种稻，则影响骑兵优势发挥，相对而言有利步兵，故形成农牧交错。

“辽史”记载更为明显。《契丹国志》称，南京（即现在北京）一带“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辽代南京一带曾种稻。早在唐代燕蓟地区就有种稻记载，辽初因多种原因却不再种稻。辽景宗保宁年间（969—978），汉臣高勋曾“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上奏朝廷，景宗本想接纳他的建议，但契丹大臣耶律昆却说：“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这些话引起景宗的疑虑，高勋种稻之策没被采纳<sup>[1]</sup>。南京种稻被禁止，直到道宗清宁十年（1064）还继续颁布“禁南京民决水种粳稻”之禁令<sup>[2]</sup>。此乃针对

[1] 《辽史》卷八五《高勋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2] 《辽史》卷22《道宗纪》二，中华书局点校本。

“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大规模军事行动基本停止，北宋王朝已无力收复燕蓟，辽对宋防范虽已渐松懈，但仍有顾忌。随着南部边境太平，燕蓟一带百姓已打破禁令，开始自发种稻。道宗诏令即是对自发打破禁令种稻而发。而因边境平静，百姓种稻迫切要求，辽中后期粮食需求量加大等，一味限制种稻已不现实，故道宗咸雍四年（1068）正式诏令“南京除军行地，余皆得种稻”<sup>[1]</sup>。其实种稻禁令解除之前，燕山山麓地带就有种稻记载，如盘山附近的祐唐寺，早在圣宗统合初年碑文中就有“红稻香粳”<sup>[2]</sup>记载。

### 三、自然条件与漕运对水稻发展的影响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西边太行山东麓之水与北方燕山南侧之水，皆集中于天津由海河干流入海。贯穿于天津市区海河干流，上游有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及北运河等五条河流，且含纳300余条支流。这些干、支河道形似一大扇面，覆盖在华北大地上，而海河干流就是巨扇柄。干、支河流之水汇聚于海河流入渤海。

天津因水而忧，海河流域汛期降水集中，诸河上游水多时，顺势倾泻而下，海河干流这唯一泄水口宣泄不及，易造成洪涝之灾；春旱是华北地区气候一大特点，诸河亦水少，因本地水资源匮乏，故开源节流，而使下游出现旱灾。而春季正是稻田“拉荒洗碱”用水高峰，造成天津易涝、易旱，皆不利水稻种植与发展。

自东汉建安九年（204）曹操为征袁绍残余势力，“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开凿了白沟渠。建安十一年（206）曹操派董绍先后开凿了平虏沟和泉州渠与新河。而形成河水入海西、北两方多一条阻障，即西山，北山之水入海，需先过新开这些河渠。到隋代后，又在旧有水

道基础上，修建通济渠、山阳渠、永济渠及江南运河，打通自余杭（今杭州）至涿郡（今北京）两百多公里水运通道。不过当时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船只是行永济渠北段利用卢沟水，经霸州附近到涿郡。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改凿东移，河经靖海（今静海县）、柳口镇（今杨柳青）直至通州。到贞祐二年（1214）前粮道断绝。

至元八年（1271）元朝建立，都于燕京（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灭亡，元统一南北疆域。至此京城官俸，军民所需粮、布、绢均由江南运来，且由直沽接卸转运。元朝后开辟海运，同样由直沽转运到京城。元亡明兴，大运河漕运得到发展。清继明漕运仍走大运河，漕粮集中到天津，由天津转驳走北运河进京。漕运一年两季，即春季与秋季。春季要导流，即把水供给运河，保证漕船航行之需。而春季是枯水期，各河之水给运河保漕运，就无水供给农业，而种稻是春季耗水之大户。这问题在清末建九宣闸时就具体化。九宣闸（即靳官屯闸）建闸时闸板八块，各高一尺五寸，规定无论水势如何最多只能提起五块，保证运河水深八尺以上以保漕运。正因保漕运，在枯水季节需水植稻也就无水可盼。这也是明、清发展水稻一大限制因子。雨季来临水多，不管农业是否需水，为保漕运，防溃堤，大量向农村放水，以利漕运渠安全。

天津多水，利于发展水稻是指总水量。而发展水稻春季洗碱之际缺水是历史问题，只有各自备水（蓄水）方可有效解决。在历史上海河干流左岸水稻较右岸开发缓慢，海河之水保漕运不保农田亦为一重要原因。故水制约着明、清时期天津水稻发展。

[1]《辽史》卷22《道宗纪》二，中华书局点校本。

[2]《全辽文》卷五，《祐唐寺创建讲堂碑》。



#### 四、土地盐碱与治碱稻改对水稻发展的影响

天津老稻区大部分在海河两岸，而近海多为盐碱地，尽管在蓟县山麓有小部分稻田不是盐碱地。天津盐碱地成因是退海之地，通过地质调研已明确。天津是海退与黄河从此入海淤积而成，考古工作者经二三十年反复勘察，证实天津平原东部至少排着三条明显贝壳堤，是古海岸线遗迹。

一是北起天津市东南田庄，经大王庄、巨葛庄、南八里台、中塘村一带，中间又有分支。据测定它生成距今三千八百至三千年前，可代表殷商时期海岸线。

二是北起宁河小涌沽，经芦台与东丽白沙岭、军粮城、泥沽、上古林、老马棚口至黄骅市歧口、狼子。周定王五年（前 602）黄河改道后形成，可代表春秋时期到唐代的海岸线。

三是北起汉沽区蛭头沽，南经北塘、塘沽、高沙岭、唐家河、老马棚口，从岐口往南与第二条贝壳堤重叠。这条贝壳堤明末为海防前哨，清初始有渔民定居，新中国成立后修筑了防潮堤。

三条贝壳堤证实了海退，亦说明黄河在此入海泥沙淤积于海相层上逐渐成陆。

天津老稻田分布于这三条古海上的一、二之间，亦是成陆在 3000 年之后的地段，越是近海成陆时间越晚。海成陆年限越短，土地淋洗时间亦短，土地盐碱亦多。因地下有埋藏很浅的海相层，海相层是海相沉积物。从现有“天津城市规划局津塘地质剖面图（片段）”可看到，海相层埋深越近海越浅，虽有起伏，埋深厚的地方 3 米以上，最浅的基致可到地表。而海相层的厚度则是由薄越向海边走则越厚，由不足 10 米到海边已达 14 米之多。这海相层是天津盐碱地的主要来源。

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入海处，大部分地势低洼平坦，加之河流纵横，沟渠交错，形成很多

封闭洼淀。因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矿化度高，径流不畅，海相层埋藏浅；又因天津气候特点蒸发量大于降雨量，故造成诸多盐碱地。而盐碱地上种植收获甚少，甚至无收获。

洗碱种稻是天津种稻主要措施，河水是主要水源。河水自流灌溉在津有三种引用形式。

一是潮汐灌溉：主要区域在海河干流两岸。历史上天津有潮不过三杨之说，即涨潮不过杨芬港（市郊）、杨柳青、杨村。天津海河建闸前一日两潮，利用潮水异重流原理：因含盐上溯海水与上游流下淡水具有不同比重，含盐海水比重大，位于下层，形成分流层，上层淡水含盐量当小于 0.3% 时可用于灌溉稻田，落潮时排水。在涨潮时抬高河水水位，水可自流入稻田中，也可流入甜水沟，供较高地提灌之水源。明汪应蛟经调研提出：“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以闽浙濒海沿地执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为稻田。”汪应蛟围田种稻，“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通，深广各一丈五尺，四面筑堤以防洪涝，高原各七尺、又中间沟渠之制，条分缕析”。即用潮汐灌溉。试之取得佳绩。天津从此开始种稻治碱。清初蓝理筑蓝田，“河渠围圩数十里的河网”，主要也是用潮汐灌溉。清同治年间，崇厚开排地亦用潮汐灌溉。晚清小站屯垦为防南运河水不足，靠海河干流亦有潮汐灌溉之设备。

二是引运河水：清周盛传改历代发展水田单依靠海河潮汐灌溉之一贯作法，提出引南运河水灌溉。因“南运河会漳河浊流，本有‘石水斗泥’之喻，其肥尤可化碱而成腴矣”。因漳河流经黄土高原，带大量泥沙汇入南运河。其大量沉积之有机肥料，可改良小站垦区盐渍土地。选派人员“携带水平尺长竿由运河沿起，顺马厂新城大道左边节节较量”，结果“马厂高

（下转第 54 页）

# 天津进士赵銮扬生平考略

雍 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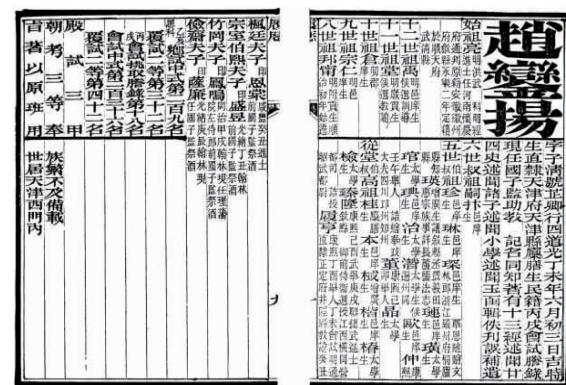
赵銮扬<sup>[1]</sup>，字子清<sup>[2]</sup>，号芷卿<sup>[3]</sup>，清末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人，生于道咸年间（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世居“天津西门内”。光绪元年（1875）中举，1892年考中壬辰科进士。历官国子监助教、本裕仓监督、吏部主事、云南武定直隶州知州等，品秩为正五品。

关于赵銮扬生平事迹的研究性述作，迄今尚付阙如<sup>[4]</sup>。本文对其科举履历、为官经历、学术阅历等基本情况予以梳理，并对其生年、历官年代等问题予以判断，从中可窥晚清进士仕途特征和迁转轨迹之一斑。

## 报捐助教 挑取誉录

1892年壬辰科《会试朱卷》载有赵銮扬及家族三代以上履历、会试全部文章以及考官批语<sup>[5]</sup>。此为研究赵銮扬科举时代生平事迹的文献依据。

赵銮扬祖上是因天津设卫建城而从安徽北迁徙津的。其始祖赵亮，为“明洪武科明经进



1892年壬辰科《会试朱卷》所载赵銮扬履历和科分页（记载科分名次、中式等第以及主考官姓名、官阶、批语等）首页、末页

士，任河南怀庆府通判。原籍安徽徽州府歙县，永乐二年（1404），定籍于顺天府武清县”。其八世祖赵邦宁，为“明附生，顺治初年始迁天津府天津县”。其父赵炽昌，为“太学生，候补布政司理问，敕封儒林郎，覃恩诰赠奉政大夫、国子监助教加五级”。

赵銮扬出身于天津县学廪膳生。同治末年

[1] 也被载为“赵鸾扬”，如：武定直隶州“赵鸾扬，直隶人”。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二）》卷十三《历代职官表（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9页。此载非是。

[2] 也被载为“字子青”，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728页。

[3] 也被载为“字芷清”。高凌雯纂：《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二《荐绅（二）》，1931年刻本，第28页。

[4] 《明清天津进士题名录》为涉及天津县籍进士的最新研究成果，但对于赵銮扬生平事迹，亦仅寥寥数十字。天津市和平区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和平区政协编：《明清天津进士题名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5页。

[5]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78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1—103页。



至光绪初年，分别在天津辅仁书院<sup>[1]</sup>、天津问津书院及北京金台书院、北京愿学堂就读<sup>[2]</sup>。其与天津会文书院也有密切联系<sup>[3]</sup>。

1875年，赵銮扬赴京参加乙亥恩科顺天乡试，中式第二百〇九名举人（覆试第二等第三十名）<sup>[4]</sup>，获得参加会试、考取进士的资格。

1879年，按照筹饷事例，赵銮扬报捐国子监助教，后被分发至广业堂。《申报》1879年1月16日《分发验看名单》载：“筹饷例掣签分发：……国子监助教，赵銮扬，直隶。”

按：筹饷例，即捐纳事例。

1886年，赵銮扬参加丙戌科会试，虽然未能中式贡士，但有幸被挑取眷录。《申报》1886年6月7日《琼林佳话》载：“本科会试大总裁，于荐卷中挑取眷录，计八旗、各省共八十名。当由礼部备文，连前卷一并咨送吏部，俟各馆咨取眷录时，分别传送。”赵銮扬的荐卷为八十名之一，等第为第十八名。可见，挑取眷录的难度也很大，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考进士。

按：清制，在方略馆等机关内担任缮写者，亦称眷录。参加会试的举人如未能中式，可选充眷录。

挑取眷录，虽属退而求其次，但成为赵銮扬跻身官场、除授升迁的重大契机。

[1] 同治末年，赵銮扬已在天津辅仁书院就读。撰于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的《诔丁煦亭封公文》一文，由赵銮扬等159名天津辅仁书院生员联名。丁煦亭即直隶天津道丁寿昌之父丁世和（号煦亭）。原载《荣哀录》下卷第2—5页，光绪元年冬（1875年底至1876年初）编印。

[2] 金台书院位于北京崇文门外东晓市街金鱼池巷一带；愿学堂位于北京宣武门内。

[3] 长芦盐运使如山选编、光绪七年（1881）刊刻的天津《会文书院课艺初刻》卷首《肄业姓氏》，开列“将课艺送院备选者”24人，又开列“乙亥（1875）、丙子（1876）、丁丑（1877）三年内肄业者”共计49人。其中，收录赵銮扬等23人的四书文49题80篇，包括赵銮扬的19篇。参见鲁小俊著：《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2—523页。

[4] 《申报》1875年10月20日《乙亥恩科顺天乡试题名全录》载：“赵銮扬，直隶天津”。

[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2513—2514页。

[6] 《申报》1892年5月8日《电传壬辰科会试题名全录》载为“赵銮扬，直隶”；《申报》1892年5月16日《壬辰科京板会试题名全录》载为“赵銮扬，直隶天津”；《申报》1892年5月18日《壬辰科会试官板题名全录》载为“赵銮扬，直隶天津，廪”；《申报》1892年6月3日《金榜题名录》所载的此科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者之中，包括“赵銮扬，直隶天津”。

## 殿试登第 三甲归班

截至1892年壬辰科会试之前，赵銮扬仍任“国子监助教、记名同知”。

此科会试，从4月4日至13日，连续考三场（共计十四道题）。考生竞争不可谓不激烈。据翁同龢（时任会试正考官）记载：光绪十八年三月初七日（1892年4月3日）“辰正，进题纸，六千八百张”。其中：第一场“实到六千四十八人”、第三场“实到五千九百九十六人”<sup>[5]</sup>。

虽然会试中式概率约计5%，但赵銮扬经受住“车轮战”的检验和“消耗战”的折磨，最终脱颖而出。考官对其总体评价不低：本房考官“荐批”称之：“援据既十得八九，而疏证又多古义确诂……皆诸卷所罕见，可谓读书有心得。”正考官翁同龢“中批”称之：“考据精辟，经策博大。”可见赵銮扬不仅熟读经书，而且善于运用。

此后，赵銮扬再接再厉，连连闯关，一举登第。据《上谕档》《会试朱卷》载，赵銮扬的中式等第分别为：会试第二百三十六名贡士、覆试第二等第四十二名、殿试第三甲第一百七十七名进士、朝考第三等第三十七名<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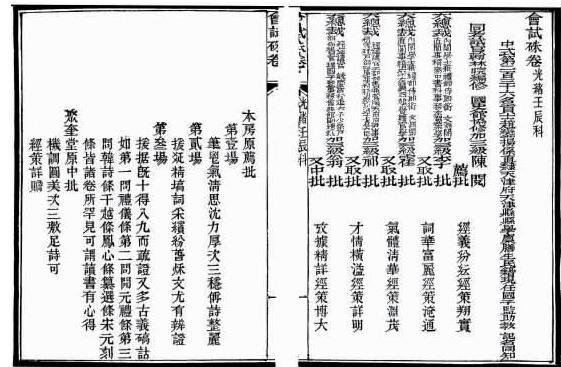
《清实录》光绪十八年五月戊午（1892年5月26日）上御太和殿，传胪：“授一甲三人，刘福姚为翰林院修撰，吴士鉴、陈伯陶为编修，赐进士及第；二甲恽毓嘉等一百三十二人，赐进士出身；三甲饶宝书等一百八十二人，赐同进士出身。”

又据《上谕档》载：“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一日、十二、十三、十四日（即1892年6月5日至8日），引见新进士。除一甲三名及京外官以本班用十一人外，朱笔圈用庶吉士九十五人、部署八十七人、中书十七人、即用知县九十六人、归班九人。”

赵銮扬在殿试、朝考中的成绩均不甚理想，由于排名靠后，当时连掣签分发即用知县的资格也没达到，只得归班铨选，暂且忍耐（依例三年后迁转）。《清实录》光绪十八年五月辛未（1892年6月8日）上谕：“引见新科进士。得旨：……国子监助教赵銮扬，均着以原班用。”<sup>40</sup>不过，赵銮扬在留任原职基础上寻求晋身机会，大有希望。毕竟新科进士这个身份，可助其立足现岗拓展空间。



赵盛扬于 1892 年壬辰科中式进士之后获  
召见时的引见履历单



# 1892年壬辰科《会试朱卷》刊载的考官对赵銮扬会试卷批语

## 多次应考 兼充试差

有幸取得“赐同进士出身”，为赵騤扬日后升级奠定了基础，但仍有一个逐渐进取的过程。此后，赵騤扬继续在国子监担任学官，仅徘徊三年就迎来转机。而相继三次获得乡试试差（阅卷官、监考官等试官）资格，则为其进阶增添了砝码。

### (一) 1893 年首任乡试试差

《申报》1893年6月13日《宫槐日影》对此记述较详载：“此次在保和殿考试试差之翰、詹、科、道、部属、中翰，计共三百五十余员。试卷循例由阅卷各堂宪评列，拟等进呈，吏部覆于四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带领引见，并备文行知各衙门查照。”

试差考试与进士考试的规格相仿。《申报》1893年6月14日《虞陛熏琴》所载，可窥试差考试的壮观场景：“本月十五日，保和殿考试试差人员。缴卷后，监试王大臣将试卷汇集，每五十本一束，送入南书房。十六日晨，枢臣开单奏请钦派阅卷大臣。奉朱笔，圈出‘大学

[1] 《申报》1892年7月20日《朝考授职名单》开列的归班者，共计21人，包括赵銮扬。



士福锟，礼部尚书昆冈，刑部尚书孙毓汶，户部右侍郎陈学棻，兵部左侍郎洪钧，刑部左侍郎阿克丹，刑部右侍郎李端棻，工部左侍郎汪鸣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志锐、王文锦。钦此。’宣旨后，福箴亭相国（即福锟）等趋入乾清门至南书房，将各卷逐一评阅拟等，进呈御览。计试卷三百数十本，额取八十名，存记候上，简充典试。”

《申报》1893年7月1日至6日所载《考试试差人员引见衔名单》，颇引人注目：“四月十五日，保和殿考试试差人员，分作四日带领引见。兹循引见排数分日列报，以供众览。计宗人府主事郭万俊等八十员，于四月十九日带领引见：……赵銮扬，直隶人。”

此前，赵銮扬尚无参与科场管理事务的经历。此次考取试差人员，有助于其丰富阅历、积累资历。

## (二) 1894年再任乡试试差

每次乡试前夕考取试差人员，都备受朝野关注。其规制为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奉旨、四月十五日开考，考场设在保和殿。

参加试差考试，除设立资格门槛外，官员也可自主选择是否应考。《申报》1894年5月20日《本馆接奉电音》载：“四月十五日奉旨：由进士出身之满汉侍郎、内阁学士、三京堂及四五品京堂内，未与考试试差者，俱着于本月二十八日在南上书房考试，其不愿赴考者，听仍向礼部声明，于开列考官本内扣除。”

考取试差者，均被张榜公布，且以被皇上引见为荣。《申报》1894年6月25日《考试试差带领引见三排单》载有四名国子监司业、助教的简历，其中包括“赵銮扬（直隶）”。

### (三) 1900年三任乡试试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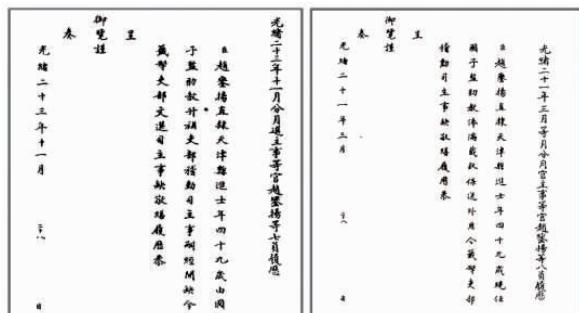
《申报》1900年5月24日《考差纪事》披露：“京师访事友人云：四月十五日在保和殿

考试试差。初时，报考者多至三百一十九员；及届期，只二百九十一员入试。适皇上恭奉皇太后驻跸颐和园。当日黎明时，由颐和园请题賚往至殿上，不免稍延时刻。有某君因病未能完卷。故是日扬华摛藻、可邀宸赏者，实止二百九十人。”

《申报》1900年5月29日《续录庚子恩科考试试差人员衔名单》载：“文选司主事：……赵銮扬，直隶。”这表明，赵銮扬已升任吏部主事（文选司属吏部）。

《申报》1900年5月30日《试题补录》还记载了本年试差考试的题目：“本年四月十五日奉旨，在保和殿考试试差，所有与试人员衔名单，已排目录登报牍。昨日，京师采访友人邮寄钦命文诗题，爰即敬谨录登于下：‘四书文题：《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经文题：《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诗题：《赋得篆刻鄙曹沈（得文字，五言八韵）》。”可见，试差考试与科举考试高度一致，考题并无明显差别。

《申报》1900年6月6日《玉堂清话》又载：“今岁，恭逢庚子恩科乡试。所有考试试差衙名单，前已备登于报。兹者京师采访友人，又将各衙门所送进士出身之侍郎以下京堂各官、例应声请钦派考官者，开列衙名、籍贯、出身以及食俸、年数、曾简放试差学差乡会试分房，开注详明，邮寄本馆，爰照登之……”



1895年，赵銮扬签掣吏部稽勋司主事，后于1897年签掣吏部文选司主事

赵銮扬资历尚浅，故未出现在此名单中。以上所载也表明，赵銮扬兼充乡试试差，以执行任务为主，承担的责任较小。

### 保送主事 外放直牧

通过以下奏折和《申报》所载，可为探究赵銮扬生平若干问题提供文献依据。

#### (一) 1895年离任国子监助教，升补吏部稽勋司主事

一是《光绪二十一年三月等月分月官主事等官赵銮扬等八员履历》（1895年4月22日）载：“臣赵銮扬，直隶天津县进士，年四十九岁，现任国子监助教，俸满截取，保送外用。今签掣吏部稽勋司主事缺。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谨奏。”<sup>[1]</sup>

二是《申报》1895年4月2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京报〉全录》所载可以为证：“分选单：主事，吏部稽勋司赵銮扬，直隶。”<sup>[2]</sup>

#### (二) 1897年以吏部稽勋司主事改任吏部文选司主事

一是《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分月选主事等官赵銮扬等七员履历》（1897年12月21日）载：“臣赵銮扬，直隶天津县进士，年四十九岁，由国子监助教，升补吏部稽勋司主事，嗣经开缺。今签掣吏部文选司主事缺。”<sup>[3]</sup>

二是《申报》1898年1月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京报〉全录》又载：“分选单：主事，吏部文选司赵銮扬。”

三是《申报》1898年1月11日《谕旨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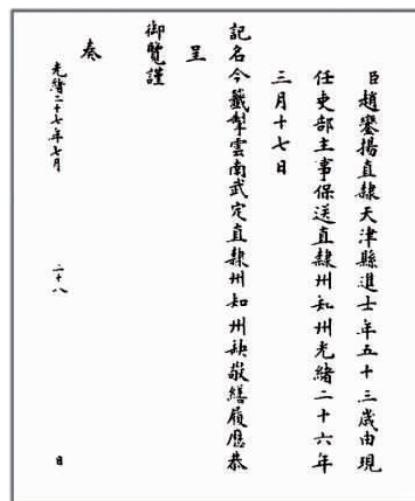
录》再载：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1897年12月27日）奉旨：“吏部文选司主事，着赵銮扬补授。”

#### (三) 1900年已具备担任直隶州知州资格

一是《申报》1900年4月23日《谕旨恭录》载：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1900年4月17日）奉旨：“……吏部主事赵銮扬，俱着交部记名，以直隶州用。”

二是吏部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1901年9月10日）进呈的引见履历单载：“臣赵銮扬，直隶天津县进士，年五十三岁，由现任吏部主事，保送直隶州知州。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记名。今签掣云南武定直隶州知州缺。”<sup>[4]</sup>

三是《申报》1901年9月15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至二十七年六月双月选单》载：“直牧：……云南武定，赵銮扬，直隶。”



1901年，赵銮扬进呈的引见履历折

按：直牧即直隶州知州的别称（各府所属州的知州别称州牧），秩正五品。

[1]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0页。

[2] 《申报》1895年5月7日《谕旨恭录》载：“初四日奉旨：吏部稽勋司主事，着赵銮扬补授。”

[3]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8页。

[4]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3页。



#### (四) 1901年前后担任户部本裕仓监督

《申报》1902年1月17日《奏疏汇录》载：“户部谨奏，为京通各仓现已归并，拟将已满、未满各监督，分别咨回留任调补，以裨仓务，而专责成……兴平仓监督桑案、本裕仓监督赵銮扬，均选补直隶州知州……”此奏后奉朱批。

按：仓监督为户部总督仓场侍郎（仓场总督）所属的仓官。

看来，赵銮扬签掣直隶州知州之前，又在户部本裕仓监督任上干过一段。

1902年，荣禄堂版《爵秩全览（壬寅夏季）》载：“云南武定州知州赵銮扬，直隶天津人，壬辰进士，二十七年（即1901年）六月选。”但这并不意味着赵銮扬已赴滇就任视事了。

#### (五) 赴任武定直隶州知州不早于1904年

1903年，武定直隶州发生过一起命案，惊动了朝廷。云南巡抚林绍年《奏报审办武定州民张闻举因奸同奸妇王张氏谋杀本夫案》载，“窃据署武定直隶州知州许祖瑞报，该前署州余艮任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一日（即1903年6月25日），据州属甲民傅元具报，鹤山脚有男尸一具……该前署州余艮未及审解卸事。该署州到任，接交覆审……”<sup>[1]</sup>

按：《新纂云南通志》开列的《清代文职府厅州县官·武定直隶州（光绪朝）》载：武定直隶州许祖瑞（浙江人）的前任为余艮（四川人），后任为直隶人“赵鸾扬”（应为赵銮扬）<sup>[2]</sup>。

可见，1904年春，赵銮扬并未在任，而是由许祖瑞署任。其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京城至云南，远隔关山，赵銮扬迟迟不愿履新，借故推脱。如此情形在清末官场并不罕见，来龙

去脉一向较为复杂；二是赵銮扬也有可能丁忧在籍守制。不过，如其暂时返津归乡，服阙27个月后，依例未必能够官复原职。笔者判断，赵銮扬因道里辽远，而视这个任命为畏途的可能性很大，虽然试图改弦更张，但最终仍硬着头皮奉旨上任。

1907年，“武定州亦有雠教举动”。《申报》1907年5月6日《电饬严防顽民仇教》载：“开缺云贵总督丁振铎近接外部电称，据驻京英使照称：‘……武定州地方，亦有仇教之举动。经转请滇督饬地方官严缉凶犯，出示保护，仍无效力。今据驻滇领事报告前来，相应照请电饬保护。’……务速严密保护、认真防范，以免酿成交涉。滇督接电，已严札各该地方官遵照办理，如违，立予撤参。”赵銮扬在知州任上疲于应付、如坐针毡，焦头烂额是可以想见的。

《清实录》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庚子（1907年10月18日）谕内阁：“锡良奏甄别属员一折：……武定直隶州知州赵銮扬，年力就衰、难期振作……着开缺，以原品休致。”

按：锡良时任云贵总督。休致，即官员年老退休去职之意。清制，分“自请休致”“原品休致”“勒令休致”“罚俸休致”等不同情形。其中，因衰老而难以胜任职务的官员，常被要求按照“原品休致”。

虽然上谕的评价不高，但赵銮扬接旨后总算可以无官一身轻了。尚未发现其在任期间有何可圈可点的作为，也未发现其有怠惰、溺职等严重情节。

#### (六) 关于曾任昆阳州知州的记载仍需考证

[1]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档资料类别159687，军机处档折件，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2] 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2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8—259页。

除担任武定直隶州知州之外，有记载还称之曾任昆阳州知州。

一是《天津县新志》载，赵銮扬历官“国子监广业堂助教，吏部稽勋司、文选司主事，本裕仓监督，云南武定州知州，署云南府同知，昆阳州知州”<sup>[1]</sup>。

天津縣新志		卷二十一	
李如玉廷璽軍功		道員	
劉宗晏	湘蕡監生	湖北府德應新江同知	
		內閣候補中書翰林院編修光祿寺 午科會試武庠生丁酉科河南鄉試	
華俊聲	少蘭進士	副考官侍講翰林院編修書郎	
蘇元龍	雨亭舉人	內閣中書典籍	
丁席珍	蘭生	蘭州平定州李平錄巡檢	
徐	鑄小舟監生	河南常平廳典史署武陽州石門司 巡檢	
趙雲揚	芷清進士	國子監庶吉士助教吏部稽勸司文 選司主事本裕倉監督雲南武定州	
世榮		原名光耀	新職專營
職員	河南永城縣典史		欵力
	知州署雲南府同知昆陽州知州		

《天津县新志》关于赵銮扬履历的记载

二是《新纂云南通志》开列的宣统朝云南府昆阳州知州中，也包括“赵銮扬，直隶天津人”<sup>[2]</sup>。

三是云南《晋宁县志》则载，赵銮扬于光緒年间任昆阳州知州<sup>[3]</sup>。

对于以上所载，似可生疑。查昆阳州位于武定直隶州迤南 100 余公里处的滇池西南畔，赵銮扬已于 1907 年奉旨从武定直隶州知州任上开缺休致，此后缘何“再作冯妇”？对此仍需探查。

工于诗文 长于书法

宦游期间乏善可陈，掩饰不住赵銮扬的文采。赵銮扬长诗文、擅书法，治学有所成就。

天津人高凌雯著《志余随笔》卷五载：“赵子青銮扬，为举业时，即治古学。及官成均，遍览‘南学’藏书，资其探讨。著有《十三经述闻》《二十四史述闻》《诸子述闻》《小学述闻》《〈玉函山房辑佚书〉刊误补遗》。子青客临颍，尝驰书往询，则谓：前书稿帙贮满箱箧，出牧云南时，寄顿京师，为人窃去。今仅存唐《月令注》、刘向《五纪论》《开元文字音义》数种而已。”<sup>[4]</sup>可见，赵銮扬亦字子青，与高凌雯有交谊（高凌雯于1893年中举，候补国子监博士）。

赵銮扬任国子监助教，遍览群书，著文立言。一介寒素，食贫自守，也不失为一种恬淡自适的生存状态。缺乏协调能力，精力不济，加之武定直隶州遐陬僻壤、官事繁冗，其被拔擢主政于此，很是勉为其难。而莅此瘠苦之区，山川阻深，对于年过半百的赵銮扬来说，长途跋涉，亦着实难以以为情。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赵銮扬难以胜任此缺是必然的。上谕评价其“年力就衰、难期振作”，毕竟只涉及精神状态。换言之，清朝的文官遴选制度，难以体现“人岗相适、人事相宜”，“不拘一格降人才”更是奢望。好在赵銮扬倒是没惹出什么大乱子，得以顺利退休，如释重负。如

[1] 1931 年版《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之二《荐绅（二）》。

[2] 季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2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3] 晋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晋宁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4页。

[4]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728页。



此平稳落地，纯属侥幸。

又按：临颍县位于河南省中部，今为漯河市的所辖县。赵銮扬羁旅豫省，缘由未详，或与豫岸芦盐（长芦盐在河南的引岸）运销有关。

另据 1931 年版《天津志略》载，赵銮扬著有《乘风书室诗集》<sup>[1]</sup>。“乘风书室”应为赵銮扬的书斋名。

赵銮扬还被列为书法家。《中国美术家大辞典》载：“赵銮扬，清代书法家。直隶天津（今天津）人，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善书，笔意凝练挺秀。”<sup>[2]</sup>

留存至今的一幅赵銮扬行书对联残件内容为：“煮云听涧雨；吹月和松涛。”<sup>[3]</sup>其落款为“商山赵銮扬”。“商山”应为赵銮扬另一字号。



赵銮扬书法对联（残）及款识（放大）

### 生于何年 记载有异

《天津县新志》把赵銮扬列为“同治朝人”<sup>[4]</sup>，此载较为含混。1892 年壬辰科《会试朱卷》载，赵銮扬生于“道光丁未年六月初三日”（1847 年 7 月 14 日）。《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会试齿录》亦载其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sup>[5]</sup>。

1892 年赵銮扬中式进士后的引见履历单则载，其时年“三十九岁”<sup>[6]</sup>（旧时常以虚岁计龄），似应生于咸丰四年（1854）。

前引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三月等月分月官主事等官赵銮扬等八员履历》及 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分月选主事等官赵銮扬等七员履历》，均载赵銮扬“年四十九岁”。其中必有一处记载不确。

吏部于 1901 年进呈的引见履历单中，又载赵銮扬“年五十三岁”，似应生于 1849 年。

显然，吏部官员进呈履历单时，未尽核查之责。而在科举时代，普遍存在虚报年龄这一“官年现象”，所谓“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官年（官龄、现年）为具报官府的年龄，常与实年（真年）不符。此举虽被指为“薄俗”，但积习难改。举人、进士朱卷履历以及官员引见履历单等开列的生年，大多存在水分。

即便如此，仍可判断赵銮扬生于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也即 1847 年前后。赵銮扬于 1907 年奉旨开缺休致之际，已年届六旬，应非无据。

（作者单位：河北区档案馆）

[1] 宋蕴璞：《天津志略》，见载于该书第 16 编第 1 章第 2 节《文艺·志书以后之著作》，北平蕴兴商行，1931 年。

[2] 赵禄祥主编：《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下卷，北京出版社，2007 年，第 1368 页。光绪十八年应为 1892 年。

[3] 明朝画家、诗人倪瓒的诗作《寄张德常》有云：“石鼎煮云听涧雨，玉笙吹月和松声。”

[4] 《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之二《荐绅（二）》。

[5] 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48 页。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朝上谕档汇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18 册（光绪十八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55、157 页。

# 旧时的津郊水会

王庆普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天津明代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成军士、破产农户和外埠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进入清朝，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商贾萃集，人口稠密，渐渐发展成为国内有名的商贸港口城市。

津郊人口聚集点同样吸纳了大量外来移民，尤其是河流要冲、水旱码头等交通便利之地逐渐形成许多人口稠密、店铺林立的街镇。这里的店铺和民居时常发生火警，因为没有消防队伍和设施，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房屋、物什毁于火灾。正如《津门杂记》中所载：“津郡人烟稠密，店铺毗连，有时不戒于火，为害甚烈。”于是，水会这样的民间消防组织应运而生。

## —

水会，亦称水局、救火会，一般由绅商富户或有名望的人士发起，邀集各商号、住户召集会众，出资建房或捐房作为会址，然后募化款项，购置救火设备，训练灭火技能，遂组成救火队伍。水会组成人员平时各自为业，一旦发生火情，众人齐聚水会奔赴火场踊跃灭火，

各负其责，世人称为善举。直接参与救火者是从当地年轻力壮的义务志愿者中挑选的，叫“武善”；掌管后勤、服务、筹措犒赏等活动，不直接参与救火的人员，称为“文善”。从中选一位较有威信者作为负责人，叫“会头”。

水会厅堂内，均供奉“火德星君”神像。白天，有承办人员办理水会具体事宜；夜晚，设有专人值班，随时做好应付突发火灾的准备。水会门板上多写“守望相助”“力能补天”“众志成城”“有备无患”等宣示宗旨的字样。水会门前备有完善的救火用具，如报警用的木梆子、锣鼓、串铃，救火用的水筒、水桶、扁担、挠钩、三齿、板斧、旧式水箱等。水筒和水桶常年盛水，可随时使用，同时也防止筒桶干裂。

条件好一些的水会还装备了在当时很先进的救火机——水机子（亦称水龙）。水机子相当于今天的消防高压水枪，一般长约4米，宽约0.7米。水机底座上安放硬木或紫铜制造的大水柜，上方支撑一根横置的大木杠作为压杠，压杠两端各有一组人，不断压抬压杠，压杠带动活塞上下运动，将水柜内的水吸入吸筒，然后压入铜质的高压罐内，水顺着水龙带进入水枪，从水枪口喷出高压水流，射向火源。水机子的有效射程一般在20米左右。

《续天津县志》“风俗”卷记载救火情况



水会使用的水机子

时写道：“遇灾即鸣锣传递，顷刻奔集灾所。与会者半属负载（搬运）贸易之人，闻声皆奋勇往救，置其货物于不顾，街市人每代为守护。火既熄，乃缓鸣其锣，按道里远近分，次序而散。”《天津通志·公安志》记载：“火灾发生后，所在地之水会以急促的锣声，或是敲梆子声向街邻报警，负责救火的‘武善’们闻讯，立即穿上号衣，按各自分工，手拿肩抬救火器具，在会头率领下飞速奔赴火场投入灭火行动。”到了火场，先找到水源，用水灌满水机子，再由四人或六人压动水机子，使水从水枪口射出灭火。没有水机子的使用水桶、水筲、脸盆等从就近的河沟、坑塘、水缸中舀水泼火。拿挠钩、三齿、斧子的人员，根据风向绝火源、打火道，甚至拆房，以免火势蔓延。灭火时，英勇向前、不顾生命危险者事后多嘉奖之，如发现极个别畏缩不前或行为不轨者，严惩不贷。火熄灭后，水会以慢节奏的敲锣声（民间称为“倒锣”），告知人们火魔已被制服。津门诗人崔旭在《津门百咏》中写道：“结社同防回禄灾，登时扑灭剩残灰。锣声几道如军令，队队争先奋勇来。”这首诗反映出当年水会奋勇救火的情形。

参加救火的人除“武善”队伍外，还有专

门负责从河里往火灾现场挑水的人，称之为“助水”。救火时，各水会按照负责地域，自行施救。如火势过大过猛，附近水会皆飞速赶至协力相助。救火是义务善举，不收费，但失火的主家要表示谢意，一般赠送些“小八件”等糕点。



清代水会救火场景示意图

水会的日常维护、添置救火器具等资金，主要依靠当地富户赞助。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火神爷”生日这天，水会有“开贺打醮”的风俗，“醮”指祭神的仪式，名曰“摆会”。水会需事先给当地富户挨家送请帖，把全部救火用具油刷一新，摆在水会内外。水会门前张灯结彩，大摆宴席招待被邀的绅商富户。来者当然不能白吃，要出资赞助，一次摆会收到的赞助费可供全年的开支。通过这样的活动，既可以广泛联络社会感情，并筹集活动钱款，还可以通过聚餐的方式，对水会人员进行表彰，激励积极者以带动全体。

参加水会的武善都是年轻力壮者，地方公益事业用人时，总要找水会协商出人出力。从平时的打更守夜、婚丧嫁娶，到皇会、庙会都有水会参与。



津郊最早的水会具有官办性质，位于海河

下游南岸津东重镇葛沽。据天津市津南区政协文史资料《千年古镇葛沽》介绍，葛沽最早的水会创建于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春天，由葛沽巡检署巡检杨敬忠提出创立，当时称太平救灾水局。局所设立在巡检署西侧班房内，最早的救火人员为巡检署的差役们。后来改为民办义务性的消防组织。清道光二年（1822），太平救灾水局移到关帝庙，后简称太平水局。

葛沽全镇共有五个水会，分布在镇内的东西南北中，除太平水局外，还有明宣德十年（1435）张紫明创办的弓长水局（后来巡检署将其改名为公善水局），清康熙十六年（1677）葛沽娘娘庙僧人所建的永善水局，清道光四年（1824）创立的天一水局，民国元年（1912）郑筠荣（郑小豆腐）出资所建的上善水局。因这五个水局以“善”字的名称多，所以称五善水局。参加水局灭火的人员一般都是葛沽码头的脚行工，义务负责五个水局的救火救灾。只要水局的锣和摇鼓一响，不论码头上多忙，他们都要放下手中的活儿，去灭火救灾。水局使用的多是水桶、水筲等简单工具，后来由郑筠荣的长子郑麟孙个人出资，给五个水局各购置了一台水机子，大大提高了救火效率。

津郊最早的民间性质救火组织是哪一家呢？据纂于乾隆四年（1739）的《天津府志》记载：“津地多火灾，廷豫立同善会，出费备救火具，至今赖之。”康熙十三年（1674），由长芦盐商、贡生武廷豫在家乡静海独流镇创立“同善救火会”（也称水会），并据此称武廷豫为有善之人，编入“义行”章节，留给后代。

静海独流镇因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3条河流在此汇成一条河流而得名。宋代时期，曾设独流东寨、独流北寨。明永乐年间，移民

至此，渐成集镇，是远近闻名的水旱码头。从清代开始独流镇已经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之地。因为店铺特别多，商人富户也不少，所以这里的水会也比较多，自武廷豫创立同善救火会后，又陆续出现了四道水会。清咸丰年间，郑记米面庄的郑祖荫捐房7间，捐款与各商号筹资购水机4台，创办保安水会；清光绪年间，经营煤炭生意的裕德号董伯皋捐房3间并出资，村民募集资金购置水机5台，开办乐安水会；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侯维申和其兄弟二人捐资1300大洋，购置水机2台，并将自家原有水机一台捐出，提供3间房屋作会堂，创办了普安水会。民国十九年（1930），豫德堂大财主吕鹤九捐9间房屋、6台水机，创办了平安水会。新中国建立后，由平安水会会长闫玉琦向商号募捐，又购置水机2台。



平安水会旧址

位于南运河畔的中国北方历史名镇杨柳青，民国时期就有7000户，人口达3万左右，水会自然更多。据《天津县乡土志辑略》中天津县公立第八十一小学校教师靳毓孝的《我的家乡》记载：“虽然没有像天津消防队那样的设备，但是私立的水会很多，计有东善、天



安、预防、天泰、六安、忠善、安离大局、二局、大同、众善、永安、平安、存德、保安等十几处，有了火时，在救火的时候，人们拼命地向火场去救火。”天津县公立第六十小学校教师庞德荫记载：“（杨柳青）有水会十几处，每逢不幸发生大火，不论冬天热天，不论夜里日间，也不分畛域（界限），就联合起来，协力同心的，一致奋勇去救，不亚于都市消防队，诚是社会的良好组织了。”天津县公立第六十小学校教师刘建章记载：“当发生火警时，即由救火会服务人员（义务职）鸣锣示众，其他会员即时到会，扛机奔赴火场救扑，急公好义之精神颇佳，均奋不顾身，救火机均有水龙带，惜平时缺乏相当训练，动作特不敏捷耳。”

北辰区双口镇地处北辰区西北部，东与北仓镇、双街镇接壤，南与西青区为邻，西、北与武清区相接。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规模虽不算大，但也有两处水会。元之钧在《天津县乡土志辑略》中《天津县北辰区双口镇概况》一文写道：“救火会共有两处，一处在乡公所内，名永安水局，一处在修全堂公所内，名修全水局。秋季火警发生时，有此二水局，农民（庄）稼场上之收获物得到不少保障。”

津郊一些村子里也有水会。据《天津县乡土志辑略》记载，天津县公立第三短期小学校教师王树桢介绍，天津县前辛庄村（津南区）内“有乡公所、警察派出所、青苗会、救火会等”。

天津县公立第十二短期小学校教师王凤书在《天津县北乡双街村通讯》中写道：“遇到

火灾，救火会武善齐来救火，武善是村人临时自告奋勇的，没有费用开销，每年有一次吃会，这天把他们邀来，无论男女小孩，随便参加大吃，意思是将来一旦发生不幸的水火灾或盗匪，可以一致努力防御。”

《天津通志·公安志》所记，到了天津解放初期，全市尚有民间水会 78 个，其中市郊 11 个，大部分水会组织涣散，器材混乱，房屋失修。1953 年，由于新中国公安消防队和企业专职消防队的健全和发展，一些水会即无存在的必要，当年经市政府批准决定，对市区距消防队较近的水会予以撤销，只对距消防队较远的市郊 11 个水会予以保留，由临近的公安消防队加以指导。直到 1985 年，天津市保留的水会还有 4 个，即静海独流镇的善安水会、平安水会、乐安水会，宁河县丰台镇的丰合水会及其东村、北村、南村分会。

随着时代的进步，水会这样的民间救火组织已经完成了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但它对扑救火灾，保障邻里、工商业安全的重大作用，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 参考资料：

- [1]郭登浩编：《天津县乡土志辑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 年 12 月。
- [2]天津市津南区政协文史委编辑：文史资料第十三辑《千年古镇葛沽》（内部资料）（第三卷），2010 年 12 月，第 61—63 页。
- [3]张显文著：《老城生活》，天津教育出版社，2017 年 3 月。
- [4]白金：《叙讲火情，当知水会——略谈清初始有的天津民间救火组织》，《天津消防》（2003/7）。

（供稿单位：津南区地方志办）

# 蒋秋吟诗涉武清谈

侯福志

二百年前，诗人蒋秋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创作了以描绘津沽风物风俗及历史文化为内容的百首竹枝词，并辑录为《沽河杂咏》一书，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武清的一些史实，为后人研究武清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史料。

蒋秋吟，名诗，字泉伯，秋吟为其字，浙江省仁和（今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人。清嘉庆乙丑（1805）进士，任庶吉士，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历房考官、兵部御史等。有《榆西仙馆初稿》《秋吟诗草》《沽河杂咏》存世。

《沽河杂咏》收录作者竹枝词一百首。与汪沆《津门杂事诗》类似，其诗作内容涉及面极广，涵盖了地理地貌、风物传说、名人轶事、历史遗迹、特产美食等方方面面。关于诗集形成的背景，作者在集前小序中做了诠释：“乾隆乙卯（1795），集试后游津门，主妇叔徐中翰家，有陈妪者，善谈沽上轶事，咏得之一百首。”原来，作者曾于1795年，沿运河从浙江原籍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考试结束后顺便游历津门。在天津期间，曾寓居在他妻子的叔叔徐中翰家。徐家有姓陈的保姆，知道很多天津卫的轶事，蒋秋吟对这些故事非常感兴趣，结合他在沽上游历时的所见所闻，创作了这一百首竹枝词。

著名学者纪昀曾为《沽河杂咏》作序。按照纪昀的说法，天津尽享渔盐之利，其繁华程度近于淮扬。但由于一直到明代才筑城设卫，直至后来“置州升府，割河间七邑隶之”，这也

不过是才70多年的事情。所以天津这个地方古迹很少，明朝以前的更是屈指可数。虽然津门“河海襟带，港汊交通，虽凫汀鹭渚，颇具水乡之胜”，但“地无寸山，岩洞涧谷之幽深，栖仙灵而狎猿鹤者，亦未之有也”。所以，各地文士往来津沽，“不过寻园亭之乐，作歌舞之欢，以诗酒为佳兴云尔”，以至于迄今天津尚“无括其风土都为一集者，非才不能，地限之也”。但这一局面被蒋秋吟打破了，其“偶客长芦，独能采掇轶事，证以图史，为《沽河杂咏》一百首，仍摭拾旧文以注之。其考核精到，足补地志之遗；其俯仰淋漓，芒情四溢，有刘郎（刘禹锡）竹枝之遗韵焉”。

纪昀高度肯定了蒋秋吟这部竹枝词的史学意义及艺术价值：其一，“余不至斯土五十余年矣，读之宛如坐渔庄蟹舍之间，与白头故老指点而话旧也”。可见，这部诗集内容多么丰富生动。其二，“读秋吟所引（指引用前人合著《沽上题襟集》），风流婉约，亦足当尝鼎一脔。秋吟此集，与之联镳齐鹜，同为艺林佳话无疑也”。在纪昀看来，《沽河杂咏》与前人之题咏集——《沽上题襟集》一样风流婉约，堪称天津艺林佳话。

《沽河杂咏》原载于清同治年间诗人华鼎元辑《梓里联珠集》钞本中，其中有10首诗入选同治年间编纂的《续天津县志·艺文》中。从内容上看，这部诗集是对汪沆《津门杂事诗》内容的补充和扩展，其注释部分多取自1739年刊



行的《天津县志》及由查礼于1741年辑录的《沽上题襟集》（内收天津水西庄主人查为仁、查礼昆季及浙江籍文人刘文煊、胡睿烈、万光泰、吴廷华、陈皋、汪沆等人的诗作）。《沽河杂咏》创作于乾隆六十年（1795），比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的《津门杂事诗》晚了56年，它主要记述和描绘的是乾隆皇帝执政后期的天津风物风俗，对于清代天津史学和民俗学研究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沽河杂咏》有五首诗涉及武清地域，概括了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 一、描绘了著名的“雍奴薮”

其第二首诗云：“南径滹沱更鲍邱，直沽海口是泉州。雍奴野淀九十九，淀淀水声皆逆流。”作者援引《水经注》的记载，对雍奴薮作了诠释：“沟水（指今蓟州、宝坻境内的泃河）又南入鲍丘水，南极滹沱，西至泉州雍奴，东极于海，谓之雍奴薮。其泽野有九十九淀。”按照《水经注》文字的本意，“雍奴薮”的四至范围是明确的，北到泃河（近东西向）、鲍丘水（今宝坻与蓟州区界），南到滹沱河（子牙河之上游，相当于静海区独流镇一带），西到泉州县、雍奴县，东到渤海湾。其在天津市的范围约相当于今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天津市区、滨海新区的塘沽、汉沽及静海北部的广大地域。《水经注》的记载，至少反映了北魏时期的状况。

### 二、记述了发生在武清的重大历史事件

其第四首诗云：“援铃擐甲涉雍奴，郡是渔阳水是沽。兵气上追张郃辈，三千劲旅又乘桴。”该诗反映了三件战争史实。

第一件史实是寇恂被封为雍奴侯。根据《水经注》记载，“雍奴，薮泽之名。汉光武（刘秀）建武二年（26），封颍川太守寇恂为雍

奴候”。另据《后汉书·寇恂传》：“建武二年，恂坐系考上书者免（指寇恂因擅自处罚上书人被免职）。是时颍川人严终、赵敦聚众万余，与密人贾期连兵为寇。恂免数月，复拜颍川太守，与破奸将军侯进俱击之。数月，斩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万户。”也就是说，寇恂因戴罪立功，被刘秀封为雍奴侯，当时雍奴县有人口超过万户。

第二件史实是“魏遣张郃、乐进围雍奴”。

张郃是东汉年间河间郡鄚县人（今属雄安新区），黄巾起义之时，他响应朝廷招募参军。公元189年，韩馥出任冀州牧，张郃在韩馥手下担任军司马。公元200年发生官渡之战，张郃奉袁绍之命去攻打曹操大营，但临阵倒戈，成为曹操手下爱将。据《三国志·张郃传》载：张郃被“授以众，从攻邺，拔之。又从击袁谭于渤海，别将军围雍奴，大破之”。据此可知，张郃围攻雍奴应当发生在公元204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张郃率领的曹军在街亭打败马谡，致使诸葛亮的北伐匆匆结束。公元231年，诸葛亮再出祁山，张郃本来守在略阳，待其追到木门，膝盖中箭受伤，不久病逝。

乐进原籍河南清丰，也是曹操手下大将，曾任右将军之职。他在镇压黄巾起义，攻打东汉大将军袁绍、袁谭时立下战功，并与张郃一起攻陷雍奴县城。据《三国志·乐进传》载，乐进“别击黄巾，破之，定乐安郡。从围邺，邺定，从击袁谭于南皮，先登，入谭东门。谭败，别攻雍奴，破之”。上述记载表明，乐进在历次重大战役中，均保持了不败的纪录。

张郃、乐进攻破雍奴城，从而奠定了曹操在北方的统治地位，为两年之后（206）曹操在武清（当时包括今海河以北的天津市区、东丽区和宝坻区）境内开凿泉州渠奠定了基础。

第三件史实是李忠臣攻打叛军石帝庭、乌承洽。公元 757 年，唐肃宗时期的大将李忠臣奉命攻打沧州贼将石帝庭、乌承洽。蒋诗援引《旧唐书》的记载云：“至德二载，李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为苇筏过海。”这里的“海”是“海口”之意，其位置相当于今滨海新区海河入海口一带。

### 三、记述三角淀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海市蜃楼”自然景观

《沽河杂咏》第二十二首诗云：“渔家谁识旧城时，市里人民宛见之。阴晦若来三角淀，不关蜃气也如斯。”该诗与汪沆的《津门杂事诗》中“似嘘蜃气作楼台”一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引自曹学佺撰《名胜志》一书云：“武清县南有三角淀，周回二百余里，即古雍奴水也。”另引自《燕山丛录》云：“三角淀云是旧城，阴晦之夕，渔人多见城堞，市里人物填集。”据笔者理解，三角淀出现的旧城是“海市蜃楼”中的景象，并非真实的旧城存。而且，这种因光线折射引起的自然现象是很普遍的，并不代表出现这种现象的地方一定有一处“旧城”。据此认为，古雍奴县城在这一带，也就更不准确了。在大海附近出现海市蜃楼是常见的，但在武清三角淀一带发生海市蜃楼，则是非常罕见的。正因为罕见，这种天象才引起历朝历代学者的注意。所以，在武清历史上，这同样是一种重大事件，并非小题大做。

### 四、反映武清境内宋辽对峙的历史现象

**(一) 《沽河杂咏》第六首诗云：**“燕山府里界河横，辽宋分疆是武清。海口汉连三女砦，古来天堑最分明。”蒋秋吟在注解中引用多种史书的记载来说明这个史实。“《静海县志》：界河即天津河，以辽、宋分界，故名。《方舆纪要》：三女寨，即今小直沽。”据史载，公元

959 年，后周周世宗北伐辽国，夺取了南燕的全部土地，奠定了北宋与辽以界河（今海河、大清河）为界的基础。公元 960 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取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正式开启了宋辽对峙的局面。当时海河以北属辽幽都府（后改析津府），海河以南属北宋高阳关路乾宁军和沧州的清池县。为防御辽兵的掳掠骚扰，宋朝利用“塘泊战术”（利用河塘、湖泊及河流等天然屏障），沿海河、大清河周边设置了一系列称“砦”（同“寨”）的军事据点。其中在清池县，就有乾符（今属黄骅市）、巷姑、三女（今市区三岔河口）、泥姑（今属津南区，称泥沽）和小南河（今属西青区）等五寨。公元 979 年，宋朝在多年休养生息后，利用自身优势开始进攻辽国，史称北伐。一直到 1004 年，宋辽之间发生多次拉锯战，最后以订立澶渊之盟结束战争。在这 25 年间，宋辽两国主要以燕、云（北京、大同）两地所属领地为战场进行争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25 年战争中，战场主要局限在河北西部（包括距离武清最近的文安、霸州等地）、山西北部，而海河干流南北地区（包括武清、静海等）几乎没有发生战事，这或许是因为海河的天然阻滞作用，以及宋朝沿海河所设置的军事寨铺起到了平衡军事的作用。

### (二) 其第三十九首诗作，同样是与宋辽对峙有关：

“一灯明灭是渔村，苇甸茫茫迹尚存。昔日曾经辽主猎，四围港汊有营屯。”宋辽对峙和宋辽战争期间，武清作为燕云十六州属县一直属于大辽国统治，大辽国曾在武清境内设置很多营盘，为保持军事力量的平衡提供了保障。蒋诗引《辽史》作注云：“重熙八年（1039）二月，猎于武清寨之苇甸。”重熙是辽兴宗名耶律宗真的年号，在他当政的第八年，也就是公



元 1039 年，辽兴宗曾到武清南部的三角淀一带打猎，并在这洼淀四周驻军。“四围港汊有营屯”即是当时的真实状况，一方面是保障南部边境安宁，另一方面保护皇帝狩猎安全。由此可见，现今武清区南部王庆坨、汊沽港一带，不仅是连接东西的水上交通要道，而且是一个原生态的风景区，芦苇丛生，野鸟云集，故成为皇帝狩猎的理想所在。

“一灯明灭是渔村，苇甸茫茫迹尚存。”出

自明朝无名氏所作《直沽棹歌》。原诗云：“云帆十里下津门，日落潮平不见痕；苇甸茫茫何处泊，一灯明处有渔村。”这是和平年代三角淀的景象，与战争年代不同，这里的野水、渔村、云帆、落日、芦苇荡，以及每天两次的潮起潮落（当时通过古海河与渤海相连），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多姿多彩的美丽画图，在战争频仍的年代，这种和平景象是难能可贵的。

（供稿单位：武清区地方志办）

（上接第 38 页）

于新城四丈七尺五寸”。于此断定“自高趋下，势若建瓴”。马厂减河筑成后，靳官屯闸和富民闸控河水自流灌溉小站十四营的稻田。但小站屯垦为防南运河水不足，靠海河干流也有潮灌潮排之设备。南运河水源来自黄河，含淤泥与腐殖质较多，水质较好，周盛传等又从家乡安徽引入水稻优良品种，及南方诸多水稻栽培技术进行治碱稻改等，从而大大提高水稻产量与米质，终使天津小站稻闻名国内外。

三是提水灌溉：随着天津植稻面积不断扩大，对地势较高或距水源较远不能自流灌溉之处采用提水灌溉方法。清乾隆《天津县志》载，“天津营田全资潮汐，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通，潮来渠满则闸而当之，以供车戽”。早在康熙年间，“城南蓝田就是使‘水车’提水灌溉”。这时水车和戽全靠人力和畜力。小站稻田开拓主持周盛传，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始，“仿南式大小摇水车六百余架。仿造葛沽骡车、牛车一千八百架，造脚踏水车一千八百架”“另购买英国八马力水车机器四架，进水管经一尺一寸，起动提水，日需煤半吨，每昼夜四架灌田可灌田四百余亩，可抵水车一百二十架”。

#### 参考文献：

- [1]（清·同治）《天津县新志》。
- [2]（清）《畿辅通志》。
- [3]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
- [4]周家驹：《周武壮公遗书》，清·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刊于金陵。
- [5]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
- [6]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水利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年。
- [7]来新夏：《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
- [8]天津市农林局：《天津市农林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47—156 页。
- [9]天津市津南区农林局：《天津市津南区农林志》，天津市津南区农林局，1994 年，第 145—192 页。
- [10]天津市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津南区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818—831 页。
- [11]刘景洲：《近代史上的小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年，第 45—70 页。
- [12]王栻、于以舜、翟乾祥：《天津历代种稻概述》，《古今农业》，1989 年，第 2 期，第 11—18 页。
- [13]郭鸿林：《清代周盛传小站屯垦述略》，《古今农业》，1991 年，第 3 期，第 35—41 页。

（作者单位：天津市种子管理站）

# 蓟州区古代的清官廉吏

刘 春

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涌现出许多清官廉吏，他们生活清廉朴素，不贪污受贿；为人耿介正直，不随波逐流；为政同情百姓，不忘国家之忧。清道光《蓟州志》、民国《蓟县志》记载了许多蓟州籍和在蓟州任职的清官廉吏。“天理良心”的道德基础使他们一生清正廉洁，把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作为奋斗目标，忠君报国，爱民如子。为了百姓利益，甚至不惜得罪权贵。本文根据清代《蓟州志》、民国《蓟县志》，梳理了书中记载的由金代到清代数位清官廉吏。

## 一、金代

赛典赤，金代西域人。金天会十二年（1134），任蓟州刺史。上任伊始，赛典赤昼不暇食，夜不暇寝，发号出令，革故从新。兴利除害，省徭薄赋，有余者取之，不足者贷之。即使向官府缴纳一钱，向朝廷贡献一物，都首先张贴布告，明示州民缴纳的数目，然后令州民自行缴纳。倘有违令的人，只书写传牌，命皂吏呼其人来到州府，竟不发一卒催索。赛典赤施政崇尚清简、宁静安谧，百姓生活不受差役搅扰，因此逃亡的人再次返回家乡。蓟州百姓口口相传，创作《鼓腹谣》赞颂他。赛典赤离职去任的时候，蓟州百姓为其立去思碑。

## 二、元代

法都忽刺，元代蒙古人。元至正八年（1348），法都忽刺受命任蓟州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掌印，位在知州之上）。下车伊始，法都忽刺遍访民瘼，予以疗治。过去官府售卖食盐时，经

纪盐业的小吏恣意盘剥，致使黎民百姓大多负债。法都忽刺上任后，革除官府售盐的弊病，使百姓各安其业。他还主持重修学宫、渔阳驿、州府公廨。除此之外，法都忽刺敦教养，课农桑，储义廪，正常平，均赋役，简词讼，扶良锄奸，击强植弱，令行禁止，吏畏民安。至正十一年（1351）春，朝廷擢升法都忽刺为御史台监察御史。蓟州州民在法都忽刺去职后用歌谣来赞颂他。

## 三、明代

崔富，明代蓟州上醴泉人。明正统六年（1441）考中举人，任邓州知州，后改任南通州知州。崔富赋性刚正，有“洁立保持贤贞”的赞誉，年纪不到60岁就要求退隐。归乡时，他手摇马鞭，骑着一头跛足的毛驴，如同平民百姓一样。崔富学问渊博，曾经增修《家礼集成》，重新校订《声律》，刊印《教民条约》，著作《盐政一覽》。

李志，明代蓟州人。李志天性至孝，母亲染疾，愿以自身替代。明景泰元年（1450）考中举人，任山西平定州知州。他为官宽厚廉谨，士人和平民都称其是循吏、良吏。李志在官任上染病身卒，百姓痛悼。李志曾作蓟州胜景《铁岭云横》诗一首，留存于世。诗云：“岭头铁石拥如屏，岭畔闲云日日横。溶泄不随烟雾散，氤氲常接戍楼平。曈曈日映如霞烂，冉冉风迎似雪轻。行客经过多感慨，思亲摇动故乡情。”

汪溥，明代安徽绩溪人，举人。成化四



年（1468），汪溥任蓟州知州，莅任视事共6年，颇有德政。蓟州百姓极力挽留汪溥再任蓟州知州一任，观风者将此事奏闻朝廷，孝宗朱祐樘褒奖汪溥，官职升级，食禄为从四品，并命汪溥再任一期。此后，汪溥编写《蓟州志》，首创蓟州修志先例。成化十年（1474），第二任期满，汪溥离任而去，升任庆远知府。赴任出城时，蓟州百姓闻讯送行，黄童白叟奔走遮道，武夫甲士免胄攀辕。有人以金银绢帛馈赠，汪溥坚决拒绝。州民购买长石一具，磨制成碑，请乡宦崔富为其撰写碑文。今碑已无存，而碑文保存在张朝琮《蓟州志·艺文》中。

欧信，明代蓟州人。成化二十年（1484），欧信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他在京师西部赈济灾荒，捐免租役、救活饥民数以万计，朝廷十分满意，随后又委任欧信为户部山西分司郎中。此时，有权贵向户部请求河东地区10万盐引的销售权，众人惴惴焉不敢出一语，唯独欧信一人论说不可。随后，欧信督理大同粮饷，增置东大有仓，乘粮贱的时候籴入，年赢蓄50余万。左金都御史刘大夏巡视来到大同时，感叹地说：“管理边储的人若都像欧郎中一样，我就不必出行了。”后来，欧信先后升任浙江布政司参政、河南右布政，转山东左布政，所在之地都赢得贤明的声誉，后又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此时，欧信选将训兵，经理屯牧不到一年，因为劳瘁过度，身卒任上。

欧思贤，明代蓟州人。嘉靖十七年（1538），欧思贤考中进士，任合肥县令。此时，恰遇歉收年月，县民纷纷逃亡，无赋税可收。欧思贤招徕并安抚逃亡的县民返回家乡定居，垦荒纳税，逃亡积弊顿时缓解。县民称赞欧思贤治理合肥有方，民受其惠，为其修建生祠。欧思贤任官三年期满，吏部考核政绩为优，转任兵部员外郎。欧思贤勤政不怠，劳瘁成疾，最后身

死官任。

燕忠，先祖是扬州泰兴人，明朝初期随高祖徙居蓟州。燕忠25岁时考中进士。成化二十二年（1486），燕忠被任命为常州府推官，期满后又改任宁国府推官。推官是掌管刑狱的官员，负责处理各种案件，惩治不法之徒。燕忠在任期间，秉公执法，惩治邪恶，打击犯罪，为民做主，遇有冤假错案，坚决予以平反。有一位商人的仆人因过失被主人责打，仆人便勾结他人杀死了这个商人，盗走所有货物。商人的家人告到官府，凶手却迟迟得不到惩治。燕忠到任后，迅速查清此案，使犯人伏法。弘治七年（1494），燕忠升为福建道监察御史，弘治十一年（1498），改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古代的一种言官，专门纠劾百司，辩明冤枉。当时浙江正逢天灾，百姓苦不堪言。燕忠到任后，直言上疏，把灾情如实向皇上陈奏，并建议皇上“亲贤纳谏，重名器，节财用，严赏罚”。由于他的陈奏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利国利民，弘治皇帝朱祐樘对他大为赞赏。朝廷采纳了燕忠的建议，使灾民得到及时救助。弘治十三年（1500），燕忠出任陕西巡按御史。上任后，燕忠考察官吏，体察民情，上惩贪官，下察民情。贪官污吏望风解印，当地百姓为之欢呼。弘治十五年（1502），燕忠迁升陕西按察副使，分管兵备军务。到任后，燕忠加强军事训练，提高作战能力，修筑边防工事，加强边防巡逻。残元军队虽多次入侵，但均被击退，使陕西毫无损害，百姓安居乐业。正德元年（1506），吏部推荐燕忠为陕西苑马寺卿。上任后，燕忠研究牧政管理，使军马数量不断增多。正德五年（1510），燕忠晋升为陕西左布政使。上任后，燕忠继续严惩贪官污吏，使之无处藏身。他还裁减了官府衙门的办公费用。燕忠廉洁自律，百姓称赞他冰清玉洁。陕西是皇帝宠

信的太监刘瑾的家乡，地方官员都向刘瑾行贿送礼。燕忠却不畏权贵，不给刘瑾送任何礼物。燕忠刚正不阿，清廉从政，刘瑾虽然嫉恨他，但没有理由伤害燕忠。正德六年（1511），燕忠升任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当年冬又改任大理寺卿。此时燕忠已官居高位，掌握生杀大权。但他不以位高而自居，不以权大而滥用。有一个叫田昆的知州，为了给一桩讼案辩冤，触怒了皇上。皇上以“大不敬”罪名将田昆治重罪收监。燕忠几次上书皇帝，为田昆洗刷冤屈，最后说动了皇上，将田昆无罪释放。某地发生饥荒，燕忠前去赈济饥民。他深入灾区察看灾情，认真核实受灾人口，将救济粮逐一发放到人。一些亲朋好友、朝中同僚托他办事，他都正色拒绝，从不以权谋私。正德九年（1514），燕忠任大理寺卿已满三年，因政绩卓然而受到皇帝奖赏，赐封燕忠之妻为诰命夫人，命其子燕鼎为太学生。后来，吏部拟推荐燕忠为吏部侍郎或兵部侍郎，但因燕忠常年勤于政务，积劳成疾，没来得及再次升迁便与世长辞，享年56岁。燕忠一生节俭，居官30年，没有置过一亩田园。逝世之时没有一点积蓄。正德皇帝得知燕忠逝世的消息，特派大臣到灵前祭悼，追赠燕忠为刑部尚书，并派专人将灵柩运回蓟州老家，葬于城东的燕氏祖茔。

阎本，明代陕西邠州人。景泰五年（1454）考中进士，后屡次升迁，任户部郎中。成化元年（1465），奉敕总理蓟州等处粮储。阎本莅任视事，生活虽寒苦艰辛，但操履坚贞，出纳平允。成化二年（1466），蓟州城北户部大仓共有仓廒54座，廒口混乱，阎本用“天字廒”“地字廒”等字号编定仓廒，凡是收储支领的粮米均照号登记，凡是倒塌疏漏的廒仓均照号修理。此法自阎本之后，延续到有清一代。阎本总理蓟州粮储三年期满，擢升都察院右佥都御

史，巡抚顺天、永平二府地方兼整饬边备。阎本走马上任，不避权要。皇宫太监某人据守州河渡口，操纵舟船，从中谋利。阎本查实之后，将该太监绳之以法。然后，用铁锁联舟成为渡河桥梁，便利行旅。阎本尤其注重发展教育，因此，士民归心，口碑载道。三年期满后，阎本因功晋升右副都御史，兼任真定、保定等六府巡抚，治理京畿事务。阎本多违忤当权大臣和朝廷显贵，不容于时世，不久便称疾辞职，自求退隐。蓟州军民遮道挽留，挥泪成霖。阎本归家之后，户部右侍郎一职缺额，吏部出面荐举，阎本遂走马上任。不久，西部边陲的甘肃、宁夏有警，宪宗朱见深任命阎本总督甘肃、宁夏粮饷。阎本赴任后，调度有方，钱粮馈运不乏，西北的将领用汉初丞相萧何来比喻阎本。边警平息后，阎本回到户部任职，不久染疾身卒。多年后，阎本的同乡、顺天府通判范泽因公来到蓟州。蓟州军民列举阎本实迹，诸如出奇策、实仓库、举将才、安要害、固城垣、精器械等，范泽听后很受感动，于是将阎本神位奉入邹公祠，祭祀邹来学、阎本、杨璇，合称三公祠。巡抚顺天、永平二府都御史刘聰撰写《阎公祠堂记》，并在祠前立碑。

毛纲，明代蓟州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毛纲考中进士，授宁王府推官，执掌审理刑狱事务。毛纲莅任视事后，持廉秉公，将王府藩校置之于法。崇王朱载境非常愤怒，以刑罚威吓毛纲。毛纲神色不变，朱载境因此而以礼厚待。毛纲历任兵部郎中、杭州知府、浙江按察使，晋升为礼部太仆寺卿、郧阳巡抚都御史。后来，毛纲升任户部左侍郎，经理钱粮，使国库充裕。不久，他辞职归乡。毛纲好学益笃，收徒10余人，按照科举内容进行教授，使他们先后都考中进士。毛纲置义田一处，用来周济族内外贫困百姓，阖里乡民倾慕其恩德，推举



毛纲入乡贤祠。

毛维驺，明代蓟州人，毛纲之侄。毛维驺性情耿介，颇具侠气。蓟州学宫倾圮颓败，毛维驺慷慨解囊，资助白银1000余两进行重修。万历十年（1582），毛维驺考中举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考中进士。毛维驺连续三次任县令，三个县都先后为他立去思碑。吏部考核政绩最优，上奏朝廷。后来，毛维驺升任户部郎中，督理宣府镇粮饷。因为违忤权势，不合于时，遭人中伤，解印返乡。毛维驺居处乡里，飘然豪宕，挥洒成文，应邀撰写《修城隍庙大殿碑记》《塔下寺碑记》两篇碑文。毛维驺病逝后，神位入文庙乡贤祠，州民按时节祭祀。

邵可立，明代河南商丘人，进士。万历四十四年（1616），任蓟州兵备副使。他秉公持正，惠政于民，不可胜数。万历四十六年（1618）夏，蓟州连日暴雨，水淹田园，两山为岸，一片泽国。民房倒塌无数，百姓只得在树上巢居。邵可立调发船户搭救溺水百姓，筹备食物若干，令船户舟载饼饵，救济巢居树上的人，救活灾民众多。州内百姓为回报邵可立恩德，在城内为他建崇德报功祠。后来，邵可立升任山西左布政使，离任登车之时，蓟州百姓洒泪相送，依依而别。邵可立的父亲曾任鸡泽县令，也多有善政，鸡泽邑人为他父亲立去思碑。

#### 四、清代

胡国佐，清代奉天人。凭借上代余荫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进入国子监读书。康熙三年（1664）学习期满后，胡国佐补官任蓟州知州。到任之后，胡国佐捐出自己的俸禄，修文庙东西两庑、戟门、棂门、照壁。公务之余，胡国佐亲率生儒讲习文艺。他劝勉州民开垦荒芜田地300余顷，民生口粮、国家丁粮都颇为充裕。他禁绝正税之外另加的羨耗，凡遇到征收羨耗时，限定时间令铺商按照市场价值报银，不多

收一文。遵化州马兰峪的皇家陵寝动工，蓟州正好路当通途，胡国佐自己捐出俸禄，雇请民夫修平道路。蓟州地处九河下流，洪涝灾害频发。胡国佐察看河势，修筑河堤，使百姓免遭水害。他严厉整饬州府的吏胥，抱牍之吏不敢侵犯一厘一毫的钱财。蓟州原来由满洲旗人圈占的良田，本应退还原主，朝廷应允用河间县的耕地补给蓟州，蓟州人民苦于河间遥远。胡国佐向直隶总督、顺天巡抚呈交公文，竭力请求以蓟补蓟，并且照原数公平补地，务使双方均沾实惠。康熙七年（1668），胡国佐升任峒山府同知。百姓闻讯，奔走呼号，挽留胡国佐再任一期。胡国佐临行之际，蓟州百姓刻石立碑，记载胡国佐的恩德。

董廷恩，清代奉天人，凭借上代余荫进入国子监。康熙十六年（1677），董廷恩由监生补官任蓟州知州。蓟州自从满人入关之后，田园土地屡被圈占。董廷恩莅任之时，旗人庄园超过半数，蓟民原有恒产的家庭叹无立锥之地。董廷恩深鉴于此，励精查核，查得不应圈拨的耕地3550顷有余，他具文详报，申明农部，得到上方允可，使被圈占的耕地复归原主。董廷恩莅任蓟州知府二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兴办义学，建立社仓，清理驿递，严饬保甲，禁捐火耗，革除赎缓，重修儒学戟门和乡贤祠，又编纂《蓟州志》，种种善政，不胜枚举。不久，董廷恩升任户部员外郎，历任湖广衡永郴道监察御史，终任湖广湖南按察使。离职去任之时，蓟州百姓为其立去思碑。

金应杰，清代蓟州三岔口村人。年少时纳粟入官，进入国子监读书。后任江宁通判。康熙三十一年（1692），改任兴县知县。兴县连年大旱，青黄不接，饿殍遍野，人难苟活。金应杰体恤民艰，在没有向朝廷奏报的情况下，擅自减免百姓丁粮，因而触犯大清律例，钦命在

县城斩首。临刑之时，金应杰自己捐出俸禄1000两白银，代替县内百姓补交丁粮。赴法场时，兴县百姓涕泣交流，攒聚路旁，攀车附辕，驱之不去。金应杰身歿之后，县民深感其德，在刑场旧地，立石碑一通，上写“泰山石敢当”，用来褒彰他的功绩，感念他的恩德。每年春秋祭祀之时，县民在城隍庙大殿恭设灵位，按时祭祀。

张朝琮，清代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人。家本平民，按照惯例捐纳财物，进入国子监学习。康熙三十年（1691），张朝琮完成学业后，任文安知县。三年期满，又转任三河知县。康熙三十三年（1694）三月，由三河知县升任蓟州知州。下车伊始，张朝琮见城西门瓮城倾圮颓败，两旁城墙部分塌陷，急欲修葺西门瓮城，怎奈力不从心。暑夏降临，淫雨连天，城墙砖石堕落，常常阻塞道路，张朝琮令各窑户烧砖和白灰，并劝导郡人捐款。文武各官纷纷捐送工费，共得200余金，不足部分全由张朝琮自己捐俸筹措。瓮城修建后坚固如初。此外，张朝琮主持修葺了州城东、南两座城门，重修县城中心的谯楼（今鼓楼）。州城城门、中心谯楼全部焕然一新，蓟州古城雄壮巍峨。张朝琮为谯楼书写两块匾额，一块悬在楼额前，题为“古渔阳”，一块悬在楼额后，题为“畿东锁钥”。张朝琮还在城内设置义学，招收无力读书的子弟，供给学费，请出宿儒，用来训育启迪学子，蓟州文风由此大振。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朝琮奉旨开浚蓟州漕运，带头捐献薪俸，雇佣民工。他连续多次泣泪上诉直隶总督，请求添拨钱粮，减轻工役。漕路得通，粮船到蓟，民受其益。这一年大水，张朝琮将官廪存储的仓米借给缺粮的千余穷民，并在州治东北建张大明王庙，祈求龙王保佑。张大明王即河神，相传能止风息浪，运粮船只赖它历险不覆。康熙

三十五年（1696），张朝琮重修州署正堂、仪门，手书正堂匾额、檐柱对联、仪门对联，为关帝庙正殿立匾。康熙三十六年（1697）正月，张朝琮奉上谕运送通州仓米4000石至蓟州，减价卖与穷民。自通州至蓟州运米所用车价银全由张朝琮捐俸雇工雇车，并不累及民间。此时，张朝琮奉上谕蠲免两年地丁钱粮。康熙三十七年（1698）冬，张朝琮捐俸在城内独乐寺、城东南天河庄设置粥厂。他捐俸做棉衣多件，委托渔阳驿丞邬棠送往受灾村庄，施舍给无衣贫民。年内，知州张朝琮重修学宫戟门，重建圣殿堂前的“礼乐诗书”坊。康熙三十九年（1700）二月，张朝琮因母丧离任。士民感谢其恩德，数百人前往京城，叩请张公留任。张朝琮竭力劝止。士民只好在西门外立去思碑，记载张朝琮的恩德。康熙四十一年（1702）张朝琮服丧期满，赴吏部等候补任官职。九月，康熙御旨“蓟州知州员缺，着将张朝琮补授”。十一月初七日，张朝琮奉旨第二次赴蓟州上任。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月，皇长子直郡王允禔赐张朝琮匾额“良牧”二字。五月，张朝琮为蓟州城3座城门各制匾1方，分别悬城门门额，东门东面书“永固”，西面书“东来紫气”；西门西面书“永宁”，东面书“西拱神京”；南门南面书“永康”，北面书“达津”。因蓟州旧志太过简略，张朝琮令渔阳驿丞邬棠重修《蓟州志》，翌年志成，文字简洁，内容详博。这一年，山东发水，流民来蓟乞食。张朝琮捐俸在独乐寺等处留养山东流民48户。次年正月按人给路费，送他们各回原籍，很多流民备受感动，哭泣而去。康熙四十六年（1707），张朝琮6年任满，离开蓟州，转任永平知府。

赵锡蒲，清代山东冠县人。嘉庆九年（1804），赵锡蒲任蓟州知州，莅职视事，兴利去弊，政尚宽简。蓟州租赋、火耗名目繁多，负载沉重，



黎民痛苦。赵锡蒲竭力除去租赋、火耗十之六七。不久因遭逢母丧离蓟去职。嘉庆十五年（1810），赵锡蒲再任蓟州知州。下车伊始，他遍览蓟州山川，在今府君山药王庙旧基建广成子殿。捐资浚挖蓟州城外东北角洗心泉，汇泉成池，引池水傍城南流，两岸栽植杨柳，并修建龙王庙，庙后建洗心亭，亭北造莲花池。一时荷花浮水，稻谷飘香，杨柳依依，人流如织，成为胜景。兴邦以儒为先，赵锡蒲倡率郡绅，修缮文庙正殿、戟门、棂星门和照壁。嘉庆十六年（1811），赵锡蒲于洗心泉之西，构屋数椽，借山水秀色，蕴崆峒灵气，移渔阳书院于此，以课诸生。以洗心亭为讲堂，题其额曰：洗心书院。

沈锐，清代浙江归安人，纳粟捐银进入国子监读书。道光九年（1829），沈锐迁升蓟州知州。当时，村民张廷祥妻孙氏被丈夫的兄长张廷喜强奸未逞，折磨侮辱致死。张廷喜强迫张廷祥以“夫殴妻死”的罪名报官。沈锐查访后得其实情，置张廷喜于法，昭雪孙氏之冤。蓟州旧有胜景八处，沈锐删去其中原为遵化州的胜景“汤泉浴日”，增添近在城北四里的胜景“崆峒积雪”，称为渔阳八景，并各制八言诗一首。自沈锐之后，凡说蓟州胜景，必称为八，延及今日，历久不衰。其八景诗有《青池春涨》《白涧秋澄》《彩村烟雾》《铁岭云横》《盘山暮雨》《独乐晨灯》《崆峒积雪》《瀑水流冰》。道光十年（1830），沈锐重修州署公廨。道光十一年（1831），编纂《蓟州志》10卷。至今人言蓟州旧事、典故，必援引沈锐《蓟州志》。道光十二年（1832），沈锐三年任期届满，吏部考察其政绩，列为优等。不久迁升顺天府南路同知。

华浚，清代江苏丹徒县人，进士。道光十二年（1832），由东安县令升任蓟州知州。华浚

廉明慈惠，吏畏民怀。当时正遇秋田歉收，华浚上报总督、巡抚，请求赈济贫民，使百姓得以活命。华浚治理诉讼案件，揭发奸邪，使之无可隐蔽。下营某营卒欲强夺民女谭刘氏意志，谭刘氏矢志不从，四处逃避。华浚赈济灾民巡视州境时，在途中与躲避的谭刘氏相遇。华浚调查实情后，惩处强暴，表彰节烈，并撰写《谭节妇诗》刻石，予以表彰。道光十六年（1836），华浚重修鼓楼，制匾两方，悬在南北楼额。原来的匾额是康熙年知州张朝琮所制，乾隆十八年地震时，匾额遗失。华浚仿照张朝琮的笔迹，重新书写“古渔阳”匾额，悬在楼额正面；书写“畿东锁钥”匾额，悬在楼额背面。华浚是回教人，来到蓟州时，回教人以为只要诉讼一定能胜。后来，有回教某人打死他人数头猪，华浚责令赔偿，不因自己也是回民而加以偏袒。华浚重视教育，以兴学为急务，重修渔阳书院，并亲临书院，按时督导，蓟州学风为之一振。华浚三年任满，离任的时候，士民立去思碑颂赞。

清代《蓟州志》、民国《蓟县志》中记述的这些廉吏清官的政绩，给后人以学范。“你为的是天下，想的是社稷，苦了自己；你穿的是旧衣，吃的是粗米，从不在意；你爱的是百姓，恨的是贪吏，一身正气；你流的是热泪，熬的是心血，勤政不息。”这是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的主题歌。于成龙廉洁勤政的高尚品德、浩然正气的人格力量和爱民如子的人格魅力，深深地震撼了观众的心。歌中那坚定而又悲怆的旋律，警示今天的党员干部，官小位卑之时要两袖清风，权重位高之日更要洁身自好，既要做一个有信仰、敢担当、讲原则的党员干部，又要做一名勤政做事、清廉干净、受百姓爱戴的人民公仆。

（作者单位：蓟州区地方志办）



## 市档案馆充分发挥档案方志资源优势 助力全市“十项行动”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档案馆党委深刻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档案方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档案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使命职责，聚焦推进档案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的目标，充分挖掘和利用好馆藏资源，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 一、深挖档案方志资源以史资政，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市档案馆立足档案方志资源优势，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深挖馆藏资源，组织编写《天津工业发展源流》《档案中的津商风骨》《杨柳青商人“赶大营”的主要历程、历史贡献及现实启示》等多篇资政文章，以图文互见、每月一期、每期一题的形式刊发在《档案方志参阅》上，为市领导同志以史为鉴、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为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和天津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围绕做好疫情防控、把脉热点问题等重要工作，用“好”用“活”档案，先后编写《天津市1957年、1968年抗击流感疫情综述》和《天津地区地面沉降灾害及其治理综述》，市领导同志批示肯定。

### 二、加强红色档案梳理保护管理，助力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

市档案馆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持续做好馆藏红色档案目录数据的整合，馆藏“革命烈士蓝运臧书信、日记”等5组16件珍贵红色档案入选《天津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对

馆藏重要红色档案资源采取分级保护措施，将珍贵红色档案纳入珍品库集中保管，做好濒危、重要红色档案的整理、数字化、抢救修复和缩微异质备份等工作。同时，广泛征集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体育、医学、文艺等方面为天津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劳动模范、艺术家、院士个人档案入馆，为全市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升级改造了人才档案库。目前，已征集包括侯德榜、朱宪彝、马达、马三立等杰出人才档案资料共5万余件。升级改造后的人才档案库，增加了红色档案元素，包括烈士档案、抗美援朝档案、院士档案、医务先驱档案等展件达到800余件。

### 三、提升档案公共服务水平，助力高品质生活创造行动

市档案馆加大馆藏档案开放力度，依法分期分批向社会公布开放档案目录1.3万条，共涉及市民政局、市气象局、市电子仪表局和市二轻局4个全宗档案。可以通过档案了解天津轻工业发展历程，手工业、工艺品制造以及一些名特优产品，研究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变化及当时的政策规定，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档案服务。优化档案、政府公开信息和地方志资料查阅利用服务，开设“绿色通道”，提升服务水平。积极做好全国开放档案查询利用平台服务工作，深化全市民生档案“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天津档案方志网、微信公众号等移动端建设，建设全市统一“掌上年鉴”小程序平台，拓展档案方志数字资源共享。为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百年校庆、南开商会历史沿革展、李大钊烈士纪念展、渤海老字号博物馆、飞鸽品牌文化馆等多家单位提供档案利用，为机关单位组织文化建设服务。

（市档案馆宣传部）

## 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开展“志书进党校”捐赠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主题教育扎实有效开展，助力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落地，7月12日，“推动方志七进，践行十项行动”暨“志书进党校”捐赠活动在天津市档案馆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共建的党性教育主题教室开展。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天津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有关领导和同志参加。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代表，阅读地方志是深入了解地域历史的重要途径。“志书进党校”活动必将为丰富党校课程内容、促进领导干部“读志用志”、提高地方志书利用率提供广阔平台。

此次向党校捐赠的地方志书共66种849册，出版时间跨越三十余年，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将为领导干部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天津历史地情，更好地服务天津经济社会建设做出地方志领域的贡献。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 市地方志办三部门党支部与市地调院自然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年鉴指导部、市地方志馆党支部赴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与地调院自然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党支部联合开展“共建谋发展，交流促进步”联学共建主题党日活动，采取座谈交流、参观见学、赠送书籍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深化馆院互动，努力构建“战略共商、资源共享、支部共建、优势互补”的党建业务工作新格局。

活动中，共建双方以主题教育联学交流开局破题，相互介绍支部党建情况和基础业务工作开展情况，围绕加强支部建设、实现资源共享、推动志鉴编修、开展历史研究等方面展开座谈研讨，展望合作前景。

市地调院向市地方志馆赠送《中国矿产地质志·天津卷》《中国区域地质志·天津志》正本及附图各4套、普及本14册。该志书的编修出版，填补了天津地质矿产领域地方志书的空

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共建支部党员干部还集体参观了市地质科普教育基地，见证天津地区上亿年地质地貌演变过程，探究天津地域历史发展变迁规律。

此次支部联学共建活动，是推动主题教育和方志“七进”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是“以党建促共建”的生动实践。双方表示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立足档案方志资源和地质调查研究资源优势，深化馆院互动，在天津历史研究范围、历史根源、地理特征变化等涉及天津发展变迁的重大历史问题上尝试拓展合作领域，力争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共同为开发天津历史资源，服务天津城市文化建设，谱写天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年鉴指导部、市地方志馆）

## 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举办第十二期方志大讲堂

8月21日，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举办第十二期方志大讲堂活动。市档案馆党委委员、副馆长吴爱民出席并讲座，方志指导部负责人夏秀丽主持，方志指导部、年鉴指导部、市地方志馆全体同志和机关党委办公室部分人员参加。

吴爱民以“‘天津’名称史志考”为题进行了讲座。他首先提出，“天津”名称来源有五种说法：星官说、诗词说、河名说、关名说、赐名说，其中以赐名说可能性最小。继而，他分析古籍之中“天津”一词的含义，认为“天津”本为星宿之名，系指“天汉津河”。在天人合一文化背景之下，星宿与地物相联系，由此产生“天津桥”“天津街”“天津关”“天津卫”等一系列地名。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从洛阳“天津”桥，到天津“天津”河，期间经历了辽元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意味着天汉津河的分野发生转移，这是中华民族发展转折之非常重要的历史标志。他总结指出，天津桥、天津街、天津河、天津关、天津卫等与天津星、天汉津河等同宗同源，都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是古代朴素宇宙观指导下的桥梁、道路、河流、城市命名的结果，寓有非常崇高、美好的意义，从“洛水”到“九河”，中国在转型、华夏在腾飞，伟大的复兴梦想必然会实现。

最后，吴爱民要求地方志工作人员在做好志书、年鉴编纂的同时，深入阅读古籍，开展地方史研究，切实发挥好学术引领作用。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 市应急管理局召开会议启动修志工作

7月25日，市应急管理局召开会议，启动《天津市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志》（以下简称《安全监管志》）编修工作。会议听取了《安全监管志》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对编修工作任务作出部署安排，明确2023年编纂工作。

会议强调，《安全监管志》是天津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编修该志书，对于了解和研究我市安全生产历史，更好把握安全生产体制改革、机构建设的规律和特点，不断提升新形势下应急管理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志书编修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编修志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论

述的实际举措，是“存史、资政、育人”的职责所系。一定要科学谋划、主动作为，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编纂好我市安全监管工作的首部志书。二要坚持质量第一，把精品意识贯穿编纂全过程。严格把好志书的政治关、史实关、专业关，确保志书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三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编修任务圆满完成。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协作配合，按照“管什么、做什么、找什么”的原则，做好担负的相应工作，切实形成修志工作合力，如期高质量完成编修任务。

（市应急管理局）

## 津南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召开 2023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会

7月27日，津南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召开2023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会。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建华、区档案局局长李仁生出席，区档案馆馆长范兆顺主持会议，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郭建华对津南区档案和地方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档案馆在经费紧张、急难险重任务叠加等多重困难下高质高效完成各方面工作，展现出忠于事业、团结奋斗的良好精神面貌，进一步巩固了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他强调：一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档案和地方志工作正确方向。忠实履行“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职责使命，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在档案和地方志工作各方面。二要持续深挖细掘，做好档案和地方志收集征集

工作。突出“特点”，多收集津南特色文化资源；突出“重点”，围绕市区重大战略、工程、活动开展工作；突出“要点”，围绕市档案局、市档案馆和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重点任务开展工作。三要坚持底线思维，夯实档案和地方志安全基层基础。做好实体档案、地方志资源和档案信息安全工作，加强外包服务安全监管，确保各项工作质效闭合。四要坚持服务大局，提升档案和地方志服务利用水平。提高档案和地方志服务决策、社会和教育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天津故事、津南故事。五要加强支撑保障，持续提升档案和地方志治理效能。加强人才培养，引导全区档案和地方志工作者敬业奉献、担当作为；用好用足资金，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花在紧要处；强化数字赋能，推进国家级数字档案馆建设。

（津南区档案馆）

## 北辰区组织召开《北辰区审判志》首发座谈会

8月16日，《北辰区审判志》首发座谈会在北辰区法院召开，北辰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砚华，北辰区档案馆馆长刘彦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北辰区法院干警、北辰区档案馆干部及志书编修组成员参加。

会上，志书编纂负责人首先对志书的整体架构、重点内容及编纂过程作了简要介绍，讲述了七年修志的艰辛历程。随后，北辰区法院部门中层代表结合工作经历，畅谈参与修志及阅读成书的心得体会。刘彦森代表区地方志办对《北辰区审判志》出版发行表示祝贺，对法院领导支持地方志工作、编修人员不辞辛劳，上下同心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推动志书顺利出版给予高度肯定，并对今后修志为用提出具体要求。刘砚华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北辰区审判志》真实记录了北辰法院不同历史时期的变

革与发展，生动描绘了一代又一代法院干警的奋斗足迹和精神风貌，是对建院70周年的一份献礼。北辰区法院全体干警要切实秉承务实担当、改革创新、永争一流的精神，用实际行动奋力书写新时代新征程宏伟蓝图。

《北辰区审判志》自2016年3月启动编纂，历时七年，数易其稿，最终成书。该书由序言、概述、大事记及组织机构、法院队伍、审判领域、党群组织等16个分章节组成，共计80余万字，收录照片300余张，真实、客观地记载了北辰法院自1953年5月建院至2020年12月的发展历程。

下一步，北辰区将继续稳步推进镇志、部门志分期分批出版发行，持续深化区级志书编修全覆盖，助推北辰区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北辰区档案馆）